

兩次世界大戰對法國女性 選舉權之影響

劉文彬*

摘要

一戰後法國政府強調生育主義與婦女的傳統角色，不願提升其政治與社會地位，法國女性爭取選舉權的行動因而受到負面影響。但女性選舉權主義者在兩次大戰期間仍不斷宣揚女性選舉權之重要性，並向國會與行政部門抗爭，社會輿論因此逐漸轉向支持此項權利。二戰導致第三共和崩潰，長期強力杯葛女性選舉權的國會參議院保守勢力亦告瓦解。二戰初期在維琪政權下，曾出現強調傳統價值的保守政策，但是二戰末期，法國政府再造，為了與第三共和切割以開創政治新局面並順應輿情，臨時諮議會與臨時政府遂於1944年通過並公布賦予女性選舉權之法令。

關鍵詞：法國女性選舉權、法國女性主義、法國女性政治地位、自由法國、兩次世界大戰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前言

一般認為，第一、二次大戰期間法國女性積極報效國家，因此法國政府遂於二戰末期給予婦女選舉權以爲補償。然而，法國女性於一戰時即積極報效國家，其奉獻之心力，不亞於其他參戰國之女性，爲何一戰後法國女性未獲得選舉權？¹一戰對法國婦女的選舉權有何影響？法國女性又爲何於 1944 年始獲得選舉權？二戰對此有何影響？二戰末期給予婦女選舉權的理由爲何？「法國婦女多數爲虔誠天主教徒，婦女在獲得選舉權之後會依教士的指示投票，將增強保守勢力，動搖共和國」的觀點僅能解釋法國婦女在 1944 年以前未被授予選舉權之部分原因，無法解答上面提出之各種問題，因爲法國婦女的信仰虔誠度並未因兩次世界大戰而大幅減弱。本文首先分析一戰時法國婦女的職業角色與社會地位，以及戰後政府不願提升其社會與政治地位之原因；其次探討戰後法國女性主義者及其組織如何向民眾宣導婦女選舉權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向行政部門與國會爭取該項權利；然後分析二戰初期維琪政權制訂不利於女性選舉權的保守政策之因素，²以及二戰末期「自由法國」（La France Libre）臨時諮議會與臨時政府決定賦予女性選舉權的原因與過程。³經由上述各層面之分析，希望能

¹ 一戰後至二戰前，授予婦女普選權的歐美國家如下：丹麥（1915），愛爾蘭、波蘭、蘇俄、德國、瑞典、英國（以上均為 1918 年），盧森堡、荷蘭、加拿大（以上均為 1919 年），美國、捷克、奧地利（以上均為 1920 年），西班牙、葡萄牙（以上均為 1931 年）。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aris: P.U.F., 2000), p. 27.

² 「維琪政權」（Régime de Vichy ou Gouvernement de Vichy, juillet 1940-août 1944）係 1940 年 6 月德軍入侵巴黎後，法國某些政治人物在德軍占領區（法國北部地區與大西洋沿岸）之外的自由區所成立的一個與德軍合作並受德軍控制的法國政府。1940 年 7 月 10 日，參眾兩院聯席召開之國民議會（l'Assemblée Nationale）以 569 票對 80 票，17 票棄權，授予貝當元帥（maréchal Pétain, 1856-1951）行政與立法之全權，參眾兩院從此休會。1944 年 6 月英美聯軍登陸諾曼第並解放巴黎後，德軍於 8 月將貝當元帥強制撤離法國，送往德國，維琪政權宣告結束。Cf. Michel Mourre (éd.), *Le Petit Mourre. Dictionnaire de l'histoire* (Paris: Bordas/SEJER, 2004), pp. 224-1246.

³ 「自由法國」（1940-1944）是在德軍入侵法國、第三共和垮台後，戴高樂於 1940 年 6 月 18 日流亡倫敦時成立的海外抗敵組織的名稱，該組織於 1941 年 9 月 24 日建立「自

了解法國婦女選舉權曾受到兩次世界大戰何種負面與正面之影響。

雖然1944年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簽署並發布的法令同時給予婦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兩種權利，但由於「選舉權」是法國婦女自十九世紀以來極力爭取的權利，故本文標題仍使用「選舉權」一詞，而不使用「參政權」一詞以概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二、一次大戰戰時與戰後法國女性的職業角色與社會地位

1914年8月戰爭開始後，法國男性被動員人數日益增加。1914年8月有370萬男性被動員，兩年後為800萬，占法國就業總人口60%。⁴除信仰社會主義的女性呼籲裁軍外，⁵多數女性主義者認為法國捲入戰爭是被攻擊後的自衛行動，因而積極分擔保家衛國的責任，以因應戰爭的需要和填補男性留下的職業空缺，俾國家的戰爭機器能順利運作，女性的職業亦因而出現新的發展。例如1915年秋，武器部部長（ministre de l'Armement）呼籲婦女到軍火工廠工作以支援前線士兵，政府並下令其他工業部門招募女

由法國國家委員會（le Comité nationale de la France libre），此委員會具有政府之雛型。雖然1942年春，戴高樂將「自由法國」改名為「戰鬥法國」（la France Combattante），但一般法國人仍習慣使用「自由法國」一詞。1943年5月底，戴高樂前往阿爾及利亞（Algérie）首府阿爾及爾（Alger）成立「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Comité français de la Libération nationale），作為法國光復前之臨時政府，由戴高樂和季侯（André Girau）共同擔任該機構主席，但季侯因無政治意識，不久即退居純粹軍事的職務，由戴高樂掌握全權。1944年5月26日，「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發布命令：此後使用「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le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之名稱。臨時諮議會（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則係1943年11月戴高樂在阿爾及爾以第三共和的一些國會議員建立的一個暫時性國會，其功能是研討未來法國解放後的政府改造問題；臨時諮議會議員總共248人。1945年10月法國舉行光復後首次國會議員選舉，臨時諮議會於選後改名為「制憲議會」，此為正式國會，國會議員586人。Cf. Michel Mourre (éd.), *Le Petit Mourre. Dictionnaire de l'histoire*, pp. 443, 971-972.

⁴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V. Le XX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02), p. 93.

⁵ 例如杜杭女士（Marguerite Durant, 1864-1936）設置一個「女性主義國際會議」（Congrès international féministe），集合各種支持女性選舉權的人士和運動。今日巴黎第十三區的女性圖書館即以其名命名。

性。由於軍火工廠薪資較其他行業高，因此吸引許多女性投入。這種工廠的女工人數在 1915 年為 15,000 人，1917 年增加到 684,000 人。⁶軍火工廠女工須以人力或機器負責生產事宜，此類工作屬高勞力且高危險之工作，意外時有所聞。⁷大體而言，女性在工廠中的工作多為機械性、重複性且非技術性的工作。⁸此時社會上也興起一股婦女參與紅十字會及救護傷兵的熱潮，許多女性擔任護士、傷兵守護員（*ange gardien*）或在紅十字會從事慈善工作（照顧陷入困境的家庭、孤兒、難民，以及協尋失蹤人口等），她們大多數為富裕的中產階級年輕女性，總人數約 12 萬人，其中志願護士 7 萬人，支薪護士 3 萬人，修女 1 萬人，女巡護員 1 萬人。⁹

一些大型的婦女組織如「婦女選舉法國聯盟」（*Union française po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UFSF*）、「法蘭西婦女全國會議」（*Conseil national des Femmes françaises, CNFF*，1901 年成立）均參與慈善、縫紉、編織、協助男性被動員的家庭等工作，並加入各政黨和工會組成的「神聖團結」（*Union sacrée*），¹⁰共赴

⁶ Alain Decaux, *Histoire des françaises*, vol. 2 (Paris: Perrin, 1972), p. 983. Cf. Léon Abensour, *Le problème féministe: un cas d'aspiration collective vers l'égalité*, (Paris: Radot, 1972).

⁷ Margaret Maruani, *Travail et emploi des femm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0), p. 67; Serge Bernstein et Pierre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I. 1900-1930* (Paris: Éditions Complexe, 2009), p. 82.

⁸ Évelyne Morin-Rotureau (dir.), *1914-1918: Combats de femmes* (Paris: Autrement, 2004), pp. 129-133.

⁹ Yvonne Knibiehler, *Cornettes et blouses blanches. Les infirmière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880-1980)* (Paris: Hachette, 1984), p. 109; Arthur Marwick, *Women at War 1914-1918* (London: Croom Helm, 1977), p. 39; Margaret R. Higonnet, *Nurses at the Front, Writing the Wounds of the Great War* (Boston: North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6-159;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aris: Berlin, 2004), p. 120;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5), p. 54.

¹⁰ 雖然社會黨和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長期反戰，但一戰爆發後，它們均加入由政黨和工會組成的「神聖團結」，全力支持政府；甚至天主教會人士亦放下過去對共和國反教士政策之憤恨，加入此團結行動。一戰時有 33,000 名神職人員參戰，與不同信仰、階層的民眾並肩作戰，此種經驗使天主教會產生改變，使他們產生新精神，重新融入國家和社會，而非孤立之團體。雖然大多數婦女加入「神聖團結」，不過亦有少數激進女性主義者以拒絕懷孕之方式抗議戰爭。Cf. Françoise Thébaud, *La Femm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1914* (Paris: Stock,

國難。1914年8月17日《投石黨報》(*La Fronde*)復刊時，創辦人杜杭女士即聲明，復刊該報「非為了要求婦女的政治權利，而是為了協助婦女善盡其社會義務。」¹¹

與戰前相較，女性在其他行業的就業人口也增多，取代部分男性在行政部門（例如郵局、學校、中央部會、醫院、監獄等）的職位；貿易和服務業的女性數量增加最為顯著；某些職位名稱也因為女性的投入而出現陰性名詞，例如「女教師」（*les institutrices*）、「女郵務員」（*les postières*）、「女雇員」（*les employées*），因此一般認為戰爭是分水嶺，婦女開始大量進入工廠及辦公室工作。¹²

但必須注意的是，雖然女性職員數量較戰前增加，惟其人數並未超越男性人數，職場未出現「女性化」。戰爭爆發後，雖然工人、白領階級、企業主被徵召入伍，工商業界出現人才荒，但為時不久，政府即將重要的技術工人自前線召回工廠工作，因此工業部門裡女工較少，商業、運輸、銀行和行政部門的女性職員較戰前多，雖然某些傳統行業（例如紡織業）的部分婦女勞工轉入與戰爭有關的行業（例如鋼鐵和化學工業）工作，但非主要人力，¹³而且軍火工廠工人主要來自殖民地和國外。¹⁴

整體而言，婦女被動員的數量有限，職場並未被女性「淹

1986), p. 157;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53;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p. 105-106; Sandi E. Cooper, "French Feminists and Pacifism, 1889-1914: The Evolution of New Vision", *Peace & Change*, 36: 1 (January 2011), pp. 5-26.

¹¹ 《投石黨報》(*La Fronde*)是女性主義報紙，係杜杭女士於1897年創刊。Françoise Thébaud (dir.), *Histoire des femmes*, vol. 5. *La Grande Guerre, Le triomphe de la division sexuelle* (Paris: Plon, 1992), p. 90.

¹² Françoise Thébaud (dir.), *Histoire des femmes*, vol. 5. *La Grande Guerre, Le triomphe de la division sexuelle*, pp. 120-123;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69.

¹³ Évelyne Morin-Rotureau (dir.), *1914-1918: Combats de femmes*, pp. 198-203; Steven C. Hause, "More Minerva than Mars: The French Women's rights Campaig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Margueret Randoiph Higonnet et Jane Jeson (ed.), *Behind the Lin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01-103.

¹⁴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V. Le XXe siècle*, p. 54.

沒」。根據勞工部 (Ministère du Travail) 的統計資料, 1917 年是女性就業的高峰期, 工商業合計有 40% 為女性勞工 (戰前為 32%), 但工業部門就業女性不足該部門全數工人的三分之一;¹⁵ 例如塞納省婦女占工業人口的比重在 1914 年為 27.8%, 1919 年為 32.2% [女性「復員」(démobilisées) 從 1919 年開始]。過去一般人的印象是, 一戰是婦女進入冶金業之始; 事實上, 一戰以前已有婦女在冶金業工作 (占該行業勞工的 7%-10%); 戰前有 8,000 至 9,000 名婦女在巴黎的冶金工廠工作, 1917 年增加到 10 萬人。¹⁶ 應留意的是, 戰爭改變的是婦女占整體勞工的比率, 非職業上的地位, 而且除了鄉村農婦和前線的護士外, 女性被動員保家衛國的速度慢且晚。在軍火工廠裡, 女工 (les munitionnettes) 是最後才被雇用的人力 (較早的是來自殖民地的移民、一般平民、退伍軍人)。況且 1918 年 11 月戰爭結束後, 社會上瀰漫著愛國主義, 輿論要求婦女讓男人回到原先的工作崗位以利於國家物質與精神的重建, 婦女因此快速從軍火工廠被「復員」回到家庭 (寡婦例外), 戰爭期只是女性工作史上的插曲而已, 不能因此即認為一戰期間是女性的「快樂時光」,¹⁷ 因為她們仍承受許多社會傳統價值觀的壓力, 例如勞工界長期存在擔心女工搶走男工工作的心理, 因此女工在工廠中常遭男工和雇主歧視或不信任, 也甚少受到職業訓練。她們工時長 (平均每日工作 11 至 12 小時) 且薪水低, 與男工同工卻不同酬, 甚至被批評為排擠男人的工作機會, 在勞工階級中屬於邊緣人。¹⁸

¹⁵ 1911 年法國 2,100 萬就業人口中, 36.8% 為婦女。

¹⁶ Andrée Fourcaut, *Femmes à l'usine* (Paris: Maspero, 1982), pp. 77-78; Catherine Omnès, *Ouvrières parisiennes. Marchés du travail et trajectoires professionnelles au 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1997), pp. 96-98.

¹⁷ Yves Pourcher, *La vie des Français au jour le jour 1914-1918* (Paris: Plon, 1999), p. 165.

¹⁸ Luc Capdevila et al., *Hommes et femmes dans la France en guerre (1914-1945)* (Paris: Payot, 2003), pp. 78-81. 儘管 1920 年法律已允許女工在無丈夫同意的情況下加入工會, 但是男工支持女工加入工會的意願不高, 以致 1936 年以前大多數女工被排除於工人保護組織之外。1936 年工人罷工時, 女性工團主義者 (例如 Maria Véron) 遂喊出: 「同工同酬!」(À travail égal, salaire égal!) 的口號。

值得注意的是戰爭對兩性心理和社會的性別觀念產生的影響。儘管士兵在戰場上有英勇的表現，但恐懼是普遍現象。1917年起，隨著戰爭時間逐漸拉長，士兵厭戰情緒亦高漲，軍紀逐漸廢弛（拒絕作戰、逃兵），因為前線士兵其實非為理想而戰，而是被迫作戰（害怕被處分）。戰爭為男人帶來創傷、將兩性隔絕，男性與女性生活在不同的空間裡，前線男性在心理上產生被妻子背叛的恐懼，於是懷疑他們在前線犧牲，而妻子或未婚妻卻在後方享樂，甚至外遇，而後方的女性也擔心被前線的男性背叛，兩性互信不足，「神聖團結」出現裂痕。此種懷疑轉變成鄙視女性和強調兩性應各安其位，因此寡婦不再被稱讚。惟女性主義者認為，後方乃是「第二前線」（*le deuxième front*），婦女是「後方的戰士」（*combattantes de l'arrière*），女性因親人戰死所蒙受的痛苦，以及在物資短缺、物價高漲的困境下維持家計的艱辛，前線的男性難以理解，她們的愛國行為與付出對國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女性主義者希望婦女在後方取代男性職位的工作經驗能成為邁向兩性職業平等的跳板，或者至少使某些先前被男性獨占的行業向女性開放。¹⁹但是1918年春，女性甚至被批評是戰爭無法停止的禍首，連「總工會」也要求婦女回歸家庭，戰爭期間男性與女性傳統角色的變遷此時走向回頭路。換言之，戰爭在文化中製造了「現代對抗習慣」（*modern versus habit*）的現象。²⁰戰爭重新在兩性之間劃出一條分隔線並重建古老的男性氣概的神話：男人存在是為了戰鬥與征服，女人則是為了生育與為人母；在失序的世界中，為了和平與安全，兩性的互補是必須的，兩性之間的界線是永恆的，女人填補男人的工作職缺是暫時的現象，女性不應「男性化」。²¹亦即一戰反而強化戰前的社會觀念，婦女的社會與民事權

¹⁹ Yves Pourcher, *La vie des Français au jour le jour 1914-1918*, pp. 199-120. 參看米森（Jane Misme, 1865-1935）女士發表於《法國女人報》（*Les Françaises*）1915年3月6日的文章。

²⁰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79.

²¹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V. Le XXe siècle*, p. 141.

利與男性差距仍甚大，政治平等權利之獲得更遙遙無期。

換言之，戰爭鞏固了婦女「母親、主婦」的傳統角色，封鎖了二十世紀初的婦女解放運動，強化了男性是國家保護者的形象。傳統的性別角色被維持甚至加強，敵視職業婦女的傳統變得更強硬，社會觀念仍然抗拒婦女改變其角色，欲將女性侷限在「代理者」或「輔助者」的角色（例如填補男性空缺的女工、護士），而謂此乃基於女性「不可改變的天性」。²²戰爭其實是重新恢復兩性原有的地位，在兩性關係上具有保守的特質；女人戰時雖然擔任不同於往日的工作，但被認為是延伸其習慣上的照顧特性，並發揮一種拯救國家（其為家庭的擴大）的功能。這種特性從她們擔任護士照顧傷兵一事彰顯出來：溫柔、耐心、犧牲奉獻。因此，男人在前線（主外），女則在前線以外的地方（主內）。此種性別規範的維持，證明兩性差異的觀念深烙在當時的法國社會中。

此外，戰爭也造成「女性身體國家化」（*nationalization des femmes*）。²³寡婦的行為受到公眾的注目，她們有道德壓力，不能享樂，否則將遭譴責。不少法國婦女被敵人性侵後懷孕，懷下「敵人小孩」的法國婦女若選擇墮胎，不會因殺嬰罪被起訴，因為法國社會多數人認為這些墮胎的女性是英雄，她們保持了法國民族血統的純粹性；²⁴自願與敵人發生性關係的婦女則會被拘禁並遭唾罵。由此可知，婦女的身體除被視為屬於丈夫外，在戰時亦被視為屬於國家。

一戰結束後，所有的道德、婚姻與政治秩序都恢復原貌。戰後政府希望女性放棄工作，回歸家庭；伴隨女性復員而出現的是對女性主義的尖銳批評，以及對家庭主婦和母親的歌頌，²⁵女性就

²² 例如一名法國醫生說：「傷口交給醫生，傷者交給護士。」（*Aux médecins la blessure, aux infirmières le blessé.*）Cf.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V. Le XXe siècle*, p. 112.

²³ Françoise Thébaud, (dir.), *Histoire des femmes*, vol. 5. *La Grande Guerre, Le triomphe de la division sexuelle*, p. 135.

²⁴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60.

²⁵ 例如小說家 Colette Yver 的小說《科學公主》（*Princesses de science*, 1907）與

業人數也因而逐漸下降。²⁶1921年女性就業人數為720萬（其中工業部門約200萬），占全國就業人口三分之一，1931年降為700萬。²⁷政府與私人企業均認為解雇女工可解決經濟問題：1934年，郵局、電報局和電話局（les Postes, Télégraphes et Téléphones, PTT）遭解雇者，90%為女工；1936年雷諾（Renault）汽車廠罷工工人也要求解雇已婚且丈夫有工作的女工。「總工會」也贊成家庭主婦放棄全職工作，改做半日工。

無論是來自其他行業或是首次進入職場的法國婦女，大多數無法繼續保有其戰時的工作。根據調查所得資料（見表1：「法國婦女與全國勞動力」），1911年婦女就業人口為770萬人；1921年降到720萬人；1926年下降到700萬人。再者，僅就工業部門而言，1921年的女性職員人數已低於1906年。至1926年，女性僅占工業工人的28.6%，但1906年女性在該行業曾經占工人的34.4%。儘管戰爭造成約140萬男人死亡，但女性勞工的人數仍持續滑落（農業部門除外）。

表1 法國婦女與全國勞動力（1906-1926）

調查年份	法國勞動力（百萬）			工業勞動力			農業勞動力		
	全部	婦女	婦女比率	全部	婦女	婦女比率	全部	婦女	婦女比率
1906	20.7	7.7	37.2 (%)	6.1	2.1	34.4 (%)	8.8	3.3	37.5 (%)
1911	20.9	7.7	36.8	—	—	—	8.6	3.2	37.2
1916	—	—	—	—	—	—	—	—	—
1921	21.7	7.2	33.1	6.3	2.0	31.7	9.0	4.0	44.4
1926	21.4	7.0	32.7	7.0	2.0	28.6	8.1	3.4	42.0

資料來源：J.-C. Toutain, *La population de la France de 1700 à 1959* (Paris: Janvier, 1963), table 58-59, pp. 162-163;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aris: Berlin, 2004), pp. 132-154.（註：1916年由於法國政府忙於應付戰爭，未進行五年一次的調查，故資料從缺）

《女性主義花園》（*Les Jardins du féminisme*, 1920）即重覆此一論調。

²⁶ Michèle Riot-Sarcey, *Histoire du féminism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8), p. 74;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32.

²⁷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p. 132-154. 其中部分因素為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全國失業率增加。

倘吾人檢視一戰時法國婦女獲得的法律與政治權利，即能更加了解其社會地位之真相。戰時特殊情勢使得某些婦女得以擔任市長、代理市長或代理市議員。²⁸特殊的戰時機關，例如1916年在每個村莊成立的「農業行動委員會」(Comités d'Action Agricole)，訂定條例，給予婦女選舉權。1915年婦女也從一些民法條文裡獲得解放，獲得一些以前僅限於男性的權利；例如1915年7月3日之後，母親也能行使父親管教子女的權力(即「父權」，l'autorité parentale)。1917年3月參議院終於通過一個戰前眾議院已通過多年的法案，同意婦女可以擔任其子女的監護人(legal guardians)。法國女性主義者已為此項權利奮鬥超過二十年，她們對此感到欣慰。

但若深究這些法律上的勝利，即可知多為暫時性之措施。婦女擔任政治職位的少數例子係由於危急的情況或缺乏受過教育的男人，不能據此認為婦女的角色已延伸至政治領域。儘管上述事蹟證明了婦女的能力與勇氣，但對爭取女性選舉權的人而言，這些例子只是趣聞，不能在戰後作為參政模式。女市長之職僅被視為傳統角色之另類呈現而已：保衛市鎮就像保衛家庭一樣，也像寡婦失去丈夫之後，保護其子女與家庭一樣。戰時特殊情勢與政治行政之失序難以讓女人擔任市長之職作為戰後取得選舉權之模式。大多數情況是：某些市鎮請女教師研究並簽署文件，但她們的權力有限且代理期很短。即使婦女代理市議員，仍無選舉權。「農業行動委員會」中婦女有選舉權，也僅限於戰時，戰後即喪失此權利。1915年給予婦女「父權」的法律，其效力也僅限於戰

²⁸ 在被德軍占領或多數居民已逃離的法國北部與東部市鎮，許多婦女須自任市長俾與德軍談判，也要處理行政事務。例如 Taissy (Marne) 的女教師 Mme Fiquémont，她有兩個子女，其夫婿在前線陣亡，她起初代替其夫擔任市長秘書，後來接替高齡的市長。她應付德軍的需求，管理那個歷經砲火摧殘且多數居民已逃離的小城。又如 Mme Macherez，她是 Aisne 選出的參議員（同時也是 Soissons 紅十字會會長）的寡妻。德軍抵達該市 (Soissons) 後，到處尋找落跑的市長，Mme Macherez 在德軍占領該市的十二天中扛起市長重任。這些婦女大多是教師或神職人員，在擔任市長之前負責照顧兒童。政府公報 (*Journal officiel*) 記載政府自 1915 年起承認她們的職務並發給她們市長證書。Yvonne Pitrois, *Les femmes de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5-1916* (Genève, JH Jeheber libraire éditeur, 1916), p. 186.

時、緊急狀況和丈夫的法律同意；²⁹又如，懷疑妻子不忠而殺妻的士兵經常被法院寬恕。因此，若與十九世紀末法國婦女的法律權利相較，二十世紀初法國婦女的法律權利實無顯著進步。換言之，戰時法國政府只是在男人不在時才擴大婦女的權利，軍人返鄉，那些權利即消失；戰爭並未大幅改變法國社會女性的經濟、政治與法律權利。

事實上，戰後很多待解決的問題淹沒了女性問題，那些問題是政治人物、壓力團體和新聞界認為更緊迫的問題。例如內政方面：遭砲火摧殘地區的重建等經濟問題、難民安置、賠償和戰債問題、從戰時生產恢復為平時生產、數十萬退伍軍人的就業問題、層出不窮的勞工騷動問題、物資供應和價格穩定問題。外交方面：防衛德國的安全問題、凡爾賽和約的談判與實施、修補與戰時盟邦的關係、更複雜的反布爾什維克主義（anti-Bolshevism）國際政治問題等等。婦女的權利被視為次要事務，留待承平時再檢討，因此眾議院雖提案支持婦女選舉權，但立法未成功。³⁰婦女選舉權法案遭受的最大壓力來自欲強化女性戰前傳統角色的性別觀念。這種觀點的理論基礎是：法國人口減少，因此經濟與國家安全的重建需要的是「母親」，而非「婦女解放」。但是對女工

²⁹ Luc Capdevila et al., *Hommes et femmes dans la France en guerre (1914-1945)*, p. 97.

³⁰ 眾議員弗朗丁〔Pierre-Étienne Flandin, 「民主共和協約」（l'Entente républicaine démocratique，為中間偏右政黨）議員〕於1918年10月提出的草案是邁向婦女完整選舉權的第一步，但其提案內容有三項限制：年齡超過三十歲的婦女始可投票、限於地方選舉、不能被選舉。1919年5月20日弗朗丁的婦女選舉權案表決時，441位投票的眾議員中，341位贊成，只有97位反對此案。1922年11月21日參議院就眾議院通過之婦女選舉權案「應否交付逐條討論」進行表決。290位出席投票的參議員中，有134位支持，占總投票人數之46.2%；有156位反對，占總投票人數之53.8%；該法律草案未獲通過。Rapport de Pierre-Étienne Flandin, annexe n° 5095, 18 octobre 1918,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Pierre-Étienne Flandin, Discussion sur une proposition de loi accordant aux femmes le droit de vote dans certaines élections, 8 mai 1919,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dmond Lefebvre du Prey, Discussion sur une proposition de loi accordant aux femmes le droit de vote dans certaines élections, 15 mai 1919,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Victor Augagneur, Discussion sur une proposition de loi accordant aux femmes le droit de vote dans certaines élections, 8, 15 et 20 mai 1919,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Discussion s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21 novembre 1922, *Annales du Sénat*.

而言，在四年的工作之後，要她們否認自己對這些工作的貢獻是困難的；命令她們回歸家庭且忘記其政治訴求，也是困難的；事實上她們的政治參與意願只會增強而不會減弱。

排斥職業婦女的行為其實與反墮胎相似，乃源自家庭主義的觀念。各政黨中，只有法國共產黨（PCF）國會議員於 1933 年提出墮胎除罪的法案。但是，1935 年以後由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威脅，法共改變立場，也開始反墮胎和反避孕。³¹此後出現一連串的法律，表面上是為了保護女權，事實上是為了保護母親，這些法律使家庭的階層觀念更加穩固。³²尤其四年戰爭期間的傷亡，使法國人口數量大幅衰退，造成人口危機，法國面臨必須增加人口的壓力，因而在戰後復員工作進行之際，出現批評女性解放以及歌頌生育、家庭主婦與母親角色的言論，法國政府必須嚴肅思考生育以及女工安全的問題。³³

³¹ Michèle Riot-Sarcey, *Histoire du féminisme*, pp. 81-82.

³² 例如，1932 年的《家庭津貼法》（la loi sur les allocations familiales）、1938 年給予家庭主婦的津貼（l'allocation pour la mère au foyer）。但直到 1938 年 2 月 18 日布魯姆（Léon Blum）的「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垮台，《已婚婦女民事權利法》（la loi sur les droits civils de la femme mariée）才在國會表決通過。由於該法有關丈夫權力的第 215 條被廢除，妻子無法律能力的規定亦因而失效，此後妻子可以與他人進行訴訟、簽訂契約、在銀行開戶、就學、參加各項考試、申請護照，無需丈夫同意。然而，丈夫仍是一家之主，由其選擇居住地且可禁止妻子就業，惟妻子可向法院請求撤銷丈夫之決定。唯獨父親有管教子女的權利，直到 1970 年母親始獲准分享此項權利。

³³ 政府成立「女性工作委員會」（Comité du travail féminin）以檢討女工的特殊工作條件。1917 年 8 月 5 日的《翁捷杭法》（la loi Engerand）規定，有一百名以上女性員工的企業須設置哺乳室，另外須設置女性總監（surintendantes）負責女工的雇用與保護（然而，此女總監制度至戰爭結束時始真正實施），因為關心女工的工作與健康條件能使國家增加嬰兒數量，同時使企業主增加軍火產量，一舉兩得。國家干涉企業對女工的管理，除了上述原因外，也與社會運動（罷工）之壓力有關。由於戰爭期間物資缺乏，物價上漲，1916 年起婦女為爭取更高的薪資與更好的工作條件，多次參加罷工行動，例如參加 1916 年 6 月軍火工廠的工人罷工，要求加薪，當時總計巴黎地區有 12,371 名男工、29,965 名女工罷工；外省則有 5,425 名男工、11,119 名女工罷工；最後工人的訴求被資方接受。1917 年 5 月巴黎時裝店女工罷工，罷工的起因是許多女性屬於論件計酬工人，工作量與正規工人一樣，薪資卻較低，乃引發不滿，要求加薪。上述情形象徵工人已疏遠「神聖團結」。婦女藉其集體行動與其在生產線占有的分量，成功地成為政府、企業主與工會領袖之間談判的焦點，也成功地獲得正面回應（不分性別與年紀，同工同酬）。Michelle Perrot, “Grèves féminines”, *Les Ouvriers en grève* (Paris: Mouton, 1974), pp. 320-323;

其實法國人口的隱憂在 1914 年以前已經存在，惟一戰使之惡化。法國人口在 1850 至 1860 年間即出現自然成長幾乎停滯的現象，1881 年法國人口為 3,750 萬，1914 年為 3,960 萬，33 年間僅增加 210 萬人，而同時期德國人口已達到 6,000 萬人。法國每年平均增加的人口從 1881 至 1900 年間的 7 萬 5 千人降到 1900 至 1911 年間的 5 萬人，再降到 1911 至 1913 年間的 2 萬 3 千人。³⁴從「表 2：1881-1910 年法國人口變化」可以看出 1881 年以後法國嬰兒出生率逐漸下降，與死亡率之差距逐漸縮小，其結果即是人口成長停滯與逐漸老化。

表 2 1881-1910 年法國人口變化

	結婚率 (%)	出生率 (%)	死亡率 (%)	嬰兒死亡率 (%)
1881-1885	14.9	25	22.3	169
1886-1890	14.4	23.3	22	188
1891-1895	14.9	22.6	22.4	170
1896-1900	15.1	22.2	20.6	161
1901-1905	15.3	21.6	19.6	142
1906-1910	15.7	20.2	19.1	129

資料來源：Serge Berstein et Pierre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I. 1900-1930* (Paris: Éditions Complexe, 1990), p. 79.

1910 年以後嬰兒出生率持續下降，1911 年降到 19‰。³⁵然而，法國在一戰時傷亡甚大，戰爭造成法國約 300 萬人死亡（死亡人數僅次於德、俄），其中男性約 140 萬人，占就業人口 10%，占男性總人口 6%，占總人口逾 3%。戰爭也造成全國死亡人數超過出生

Mathilde Dubesset, Françoise Thébaud et Catherine Vincent, in Patrick Fridenson (études réunies par), *Cahier du Mouvement social, L'autre front* (Paris: ?, 1977), pp. 188-219.

³⁴ Philippe Ariès,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Paris: Seuil, 1971), p. 233; Serge Berstein et Pierre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I. 1900-1930*, pp. 78-79. 1914 年法國人口約與英國相當，但較義大利多。

³⁵ Jacques Dupâquier (dir.),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tome 4, *De 1914 à nos jours* (Paris: P.U.F., 1988), p. 24; Serge Berstein et Pierre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I. 1900-1930*, p. 80.

人數，出生人口減少150萬人，人口進一步老化。³⁶300至 50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多數是婦孺和老人（寡婦約 70 萬人，孤兒 110 萬人）。

1920 年代法國人口成長停滯，1930 年代下滑，1935 年起死亡率超過出生率，須引進外國移民始可彌補人力之不足，但法國至二戰前夕始推出鼓勵生育之政策。一戰後人口曾有短暫成長，主因是結婚率上升。³⁷以嬰兒出生數而言，戰後嬰兒潮使 1920 年出生 834,000 個嬰兒（出生率 21.2‰），1921 年為 81 萬 2,000 人（出生率 20.7‰），但 1922 年掉到 1913 年的水準。自 1922 年起，出生人口約在 75 萬至 77 萬人之間擺盪。1921 至 1925 年間出生率平均為 19.3‰，1926 至 1930 年間降為 18.2‰。每個家庭的人口數從 2.9 人（1906 年）降為 2.5 人（1931 年）。³⁸戰後死亡人數也逐漸下降，1921 至 1925 年年平均死亡人數為 686,000 人（死亡率 17.2‰），1926 至 1930 年年平均死亡人數為 690,000 人（死亡率 16.8‰），尤其嬰

³⁶ Philippe Ariès,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p. 247;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V. Le XXe siècle*, pp. 119-121. 一戰造成法國 280 萬人傷殘，25 萬平民死亡。一戰四年期間，每 2 百萬人中只有 19,000 對男女結婚和 93,000 個嬰兒誕生。Cf.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24.

³⁷ 1919 至 1922 年間有 200 萬對男女結婚，比率為萬分之 258；1906 至 1913 年間則為萬分之 156。離婚率也增加，1920 年有 34,079 對夫妻離婚，比戰前 1913 年的 16,335 對，多了一倍。上述結婚率以及離婚率的增加均是戰爭的結果。Georges Dupeux,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70* (Paris: Colin, 1973), p. 189;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p. 129-130; Serge Bernstein et Pierre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I. 1900-1930*, p. 392.

³⁸ 低出生率有文化及心理因素：中產階級的謹慎、物價上漲和危機引起的憂慮、工人階級不願承擔過重的子女教育責任並將提昇社會地位的希望寄託在獨生子女身上、農民擔心地產因子女繼承而分散、較少遵守宗教規範等等，因此低出生率其實與法國社會風氣的變化有密切關係。Anne Moulin, *Les paysan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a Révolution à nos jours* (Paris: Seuil, 1988), p. 221;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p. 129-130. Serge Bernstein et Pierre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I. 1900-1930*, p. 392. 大城市的出生率較低，但是天主教信仰虔誠地區的出生率則較高。信仰天主教的外來移民生育率也較高，1920 年代為 23‰，同年代法國全國平均生育率則為 18.2‰。Cf. Georges Dupeux,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70*, p. 200;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33.

兒死亡率大幅下降。³⁹出生人口數減去死亡人口數，1921至1928年間，平均每年增加人口不到十萬人，1929年則為負9,000人。綜合言之，法國戰後十年期間仍未補足戰時損失人口之半數。上述情形的後果是人口老化：1901至1931年間，20歲以下的人口從占總人口的34.7%，下降到30.3%，60歲以上的人口則從12.4%增加到14%。⁴⁰

表3 法國一戰後出生與死亡狀況

	嬰兒出生數	嬰兒出生率	人口死亡數	人口死亡率
1920	834,000	21.2‰		
1921	812,000	20.7‰		
1921-1925	750,000-770,000	19.3‰	686,000	17.2‰
1926-1930		18.2‰	690,000	16.8‰

資料來源：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aris: Berlin, 2004), pp. 129-131.

1931至1939年間法國人口出現崩盤現象，生育率降到有史以來最低點。其肇因是在低出生率年份出生的人（*classes creuses*）此時已屆生育年齡，其次是世界經濟危機帶來悲觀的情緒。人口崩盤首先顯示在嬰兒出生數下降，出生數下降主要原因為結婚數下降。1930年結婚數為342,000，1938年降為274,000；嬰兒出生數則由750,000降為612,000。1938年法國的出生率為14.6‰，在歐洲大國中為最低者。1930年代法國死亡人口數也較1920年代下降，1920年代年平均死亡人口數為690,000，1931至1935年年平均死亡人口數為658,000，死亡率為15.7‰。1935至1939年間，死亡率始終超過出生率，導致人口無法正常新陳代謝，人口老化的情

³⁹ 死亡率下降的原因為工作環境的安全有改善、居住環境衛生有進步、醫療設備也改善等等。男女平均壽命亦較戰前增加，1928至1933年男性平均壽命為54.3歲，女性則為59歲。Philippe Ariès,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p. 255;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31.

⁴⁰ Philippe Ariès,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p. 258;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31.

形持續惡化。惟法國人口總數仍持續增加，原因是外來移民填補了人口赤字〔參看表 4：法國人口數（1911-1936）〕。⁴¹

表 4 法國人口數（1911-1936）

調查年份	總人口數	外國人口數	外國人占總人口比率
1911	39,600,000	1,132,696	2.8%
1921	39,200,000	1,550,449	3.7%
1926	40,700,000	2,498,230	6.1%
1936	41,800,000	2,890,923	7%

資料來源：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33.

1914 年以前因受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 1766-1834）理論的影響，法國社會有「孩子使人窮」的觀念，但一戰後法國政府欲改變這種觀念。主要原因是男人在戰時犧牲慘重、出生率降低導致人口老化、國家需要勞工，特別是 1930 年代末，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相繼採行鼓勵生育政策，對法國構成壓力。因此政府開始頌揚女性「妻、母」的角色，避孕和墮胎被法律禁止，兒童的健康母親須負最大責任，故母親不宜外出工作。⁴²政府

⁴¹ Cf. Pierre Milza et Martin Amar, *L'immigration en France de A à Z* (Paris: A. Colin, 1990), p. 147;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33.

⁴² 政府最初採取的人口政策偏向使用懲罰性措施：《1920 年 7 月 31 日法》（la loi du 31 juillet 1920）懲罰墮胎行為、禁止宣傳節育或販賣避孕器材，以任何形式，即使是私底下，鼓勵墮胎，將被罰款 100 至 3,000 法郎，再加上半年到三年的有期徒刑；若是宣導節育，則罰款將提高到 5,000 法郎。《1923 年 3 月 23 日法》（la loi du 23 mars 1923）則加重對墮胎罪的懲罰。然而，以上懲罰措施無法阻止出生率持續下滑，政府才改採有利於母親與兒童的措施，例如獎勵生育。美國於 1912 年訂定「母親節」，加拿大和英國跟進，受此影響，法國一戰後的獎勵生育政策也規定舉行公開儀式表揚多子家庭的母親，凡生育 5 個、8 個或 10 個小孩的母親，可獲頒家庭獎牌一面。生育於是具有社會功能，母親的角色是女性獲得權利的手段，因為生育與否是眾所關切之事。1932 年國會通過獎勵生育的法律（la loi du 11 mars 1932），給予人民生育津貼，但由於津貼金額微薄，無法減輕家庭養育子女的負擔，因此出生率的下降雖然減緩，卻未停止。1935 年以後，死亡人數多於出生人數，若不計入外來移民，則法國人口其實是負成長。政府因此祭出更優惠的措施，將家庭津貼與生育津貼增加二至三倍。1939 年 7 月，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政府公布《家庭法典》（Code de la famille），仍然強調反墮胎，墮胎之婦女及教唆墮胎者會受到嚴厲懲罰。

也保護婦女的社會權利，例如發給士兵的妻子生活津貼、發放寡婦年金等等。

此種生育主義與家庭主義的意識型態其實也普遍存在許多女性主義組織之中。西方婦女史專家戴波（Françoise Thébaud, 1952-）女士的研究發現：「大多數法國女性主義者認同兩性的差異與互補性、頌揚母性，她們爭取的不是女性的權利，而是母親的需求，要求給子女工特別保護。」⁴³例如「法蘭西婦女全國會議」也設立反墮胎聯盟。⁴⁴當時一般人的家庭觀念仍非常傳統，認為女人應為人母、當家庭主婦，⁴⁵因此視婦女選舉權為妨礙女性維持傳統角色之洪水猛獸，以致在兩性平權上，法國較英國與德國落後。⁴⁶

不過，一戰對法國女性的權利意識的覺醒具有正面影響。戰爭是女性進入工廠和辦公室工作的催化劑，戰時她們扛起了原屬於男人的工作，負擔家計，大戰顯示了她們的社會重要性，這種工作經驗對婦女的心理與行為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此外，女性獲得自由之經驗（經濟較獨立、生活圈不限於家庭、融入外面的世界、有自己可運用的時間），⁴⁷對女性的解放有助益。換言之，一戰使婦女獲得某種程度的自由並承擔某些社會責任，男女的職業分際亦被打破。⁴⁸況且戰後有超過 60% 婦女必須工作以維持家庭

⁴³ Françoise Thébaud,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ome 5, *Le XX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02), p. 74.

⁴⁴ Anne Cova, "Généalogie d'une conquête: maternité et droits des femmes en France, fin XIXe-XXe siècles", *Travail, genre et société* (3 mars 2000), p. 98; Michèle Riot-Sarcey, *Histoire du féminisme*, p. 74.

⁴⁵ 直到1938年法國才承認已婚婦女的民事權利。

⁴⁶ 德國的威瑪憲法（Constitution de Weimar）明言兩性平等的原則，不過未以民法與刑法規範。

⁴⁷ 男性人口因戰死而減少，寡婦獨居，甚少再婚（70萬寡婦中，只有26萬人再婚），因而享有外出之自由。經過四年分離的夫妻則彼此難以適應，離婚率增加，遂加速女性解放。Cf. Anne Cova, "Généalogie d'une conquête: maternité et droits des femmes en France, fin XIXe-XXe siècles", *Travail, genre et société*, p. 101;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26.

⁴⁸ 1920年代因而是「瘋狂的年代」（les années folles），強調女性解放，社會出現「女男孩」（la garçonne）的女性時尚，亦即女性追尋性自由與擺脫傳統的束縛。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中等甚至高等教育，單身不婚女性增加，再加上她們有獨立自主意願，這些因素使許多中產階級女性外出尋找屬於自己的事業。她們大多任職教

生計。⁴⁹女人在外工作以及負擔家計的事實影響了婦女對選舉權問題的思考，因為如果女人能像男人一樣「主外」，則為何不能與男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授予婦女選舉權即是承認女性的新角色，而且選舉權也是她們捍衛工作權益（例如同工同酬）的重要手段。保守人士擔憂婦女選舉權主義者與女性主義者會毀壞整個社會，因此是社會公敵。支持者則認為：女人不只是一個性別，而是人類，與男人一樣具有人性；社會上因性別而產生的差異是社會結構所造成，非性別的本質所造成。透過選舉和被選舉，男女的社會角色的相似性即可建立；不過，女性的「個人化」並非「去性別化」（*désexualisation*）。

1936 年「人民陣線」執政，⁵⁰國務院（*le Conseil des Affaires d'État*）終於承認女性具有「法律才能」（*l'aptitude légale*）。內閣總理布魯姆是婦女選舉權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他邀請三名女性入閣擔任國務祕書（*secrétaire d'État*，相當於部長職位）：居禮夫人（*Irène Joliot-Curie*, 1897-1956）負責科學研究事務，社會主義者拉柯兒（*Suzanne Lacore*, 1875-1975）負責兒童保護，激進女性主義者布朗絲薇克（*Cécile Brunschvicg*, 1877-1946）負責國家教育。⁵¹然而，政府任命她們的目的似乎是將她們當作樣板人物，希望藉此讓女性主義者在兩性平等問題上噤聲。矛盾的是，這些女閣員雖為其男性僚屬的上司，卻依然沒有與其男性僚屬相同的選舉權。

育界，1932 年小學女性教師占全部小學教師之 66%。Christine Bard, *Les Garçonnes. Modes et fantasmes des Années folles* (Paris: Flammarion, 1998), p. 142; Sian Reynolds,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Gender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109;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75.

⁴⁹ Léontine Zanta, "Le féminisme: ses manifestations variées à travers les faits, les institutions, les tendances, les mouvements d'opinion", dans *Semaines sociales de France, Nancy, 19e session, 1927, La Femme dans la société*, p. 27.

⁵⁰ 「人民陣線」（*le Front Populaire*）是激進黨、社會黨、共產黨等左派政黨為贏得 1936 年國會大選而組成的暫時性政治聯盟。

⁵¹ 居禮夫人任職僅兩個月，該職位後來由其友人 Jean Perrin 接任。拉柯兒則拒絕就任。Cf. Gilbert Thuillier, *Les Femmes dans l'administration depuis 1900* (Paris: Perrin, 1988), pp. 76, 95;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176;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p. 49-50.

三、法國女性主義者及其組織之作為

第一次大戰爆發後，法國女性的民族主義和男性一樣強烈，以致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驟然中止。⁵²一戰期間，婦女選舉權主義者放下抗爭行動，共赴國難，誠如「婦女選舉法國聯盟」主席布朗絲薇克所說：「在我們的祖國對抗野蠻的敵人之際，吾人不適合進行熾熱的婦女選舉權運動。」⁵³但是從大戰末期開始，法國女性主義者在婦女權益低落的大環境下繼續為婦女選舉權奮鬥，扮演改變社會保守風氣的角色，對日後婦女獲得選舉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與貢獻。

戰前各國婦女由於有共同的選舉權問題，女性主義的訴求因此具有國際性質。雖然各國女性長期反戰（1899和1907年曾舉行大規模反戰示威），並強調若婦女獲得選舉權將可防止戰爭發生，但她們從未對若真正發生國際戰爭將採取何種立場明確表態。一戰爆發後不久，國際女性主義運動與國際勞工運動一樣產生裂痕：1915年4月，1,136名來自不同國家（含交戰國）的婦女代表參加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國際婦女和平大會」（Congrès international

⁵² 1914年7月維微亞尼（René Viviani, 1863-1925）擔任內閣總理時，女性主義組織曾策劃一個約2,400人參與的支持女性選舉權的示威遊行，但一戰使此計劃驟然中止。一般而言，女性主義者反對戰爭。大多數法國女性主義者一戰時的行為其實違反她們的和平主義與性別利益，例如她們戰時積極參與慈善和救援工作所表現出的愛國主義、奉行仇德（la germanophobie）的民族主義和支持提升生育率。法國只有少數女性主義者反戰，最著名者為Hélène Brion（1881-1962），她是小學教師、女性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同時也是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她因反戰在1917年11月18日被捕，次年3月在戰爭委員會（Conseil de guerre）受審。受審時她捍衛自己的理念謂：「我被視為政治犯，毫無政治權利。……我的行為有教育意義，我是以女性主義者的意識而行動……女性主義讓我成為戰爭的敵人。」Michèle Riot-Sarcey, *Histoire du féminisme*, pp.68-75.其實女性主義者支持戰爭，與共產國際的鼓動有某種程度的關係。由於俄國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面對德國納粹主義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共產國際遂將工運與婦運結合，以壯大聲勢，對抗德義的威脅，但是婦運與工運之關係不必然就能水乳交融，以1920年12月30日共產國際在杜爾（Tours）開會並創立法國共產黨為例，當時其10萬黨員均為男性，無任何女性黨員。

⁵³ Françoise Thébaud, *La Femm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1914*, p. 115;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53.

des femmes pour la paix) 時，反戰與支持戰爭雙方即僵持不下，⁵⁴ 法國女性未參加該次會議。誠如米森女士在 1914 年 11 月 19 日出刊的《法國女人》周刊 (*La Française*) 上所言：「只要戰爭持續下去，敵國的婦女也是敵人。」(*Tant que durera la guerre, les femmes de l'ennemi seront aussi l'ennemi.*) 事實上，交戰國的女性主義者大都背棄女性國際組織，改採「國家的女性主義」(*féminisme national*) 立場，反對所有仲裁和無勝利的和平。⁵⁵ 大多數法國女性主義者亦宣布中止其訴求，俾善盡女性保家衛國之義務。杜杭女士在其創辦之報紙《投石黨報》中也撰文呼籲：「婦女們，妳們的國家需要妳們。無論我們的目標（選舉權）被承認與否，要以身為公民為榮。」⁵⁶

上述言論並不意味女性主義者願意被社會邊緣化。一戰後法國婦女自覺在社會上已漸能自立，雖然仍有許多障礙，但是教育程度提高，使其能勝任新的行業、走出傳統婦女的角色，並在許多公共領域逐漸獲得一席之地。「法蘭西婦女全國會議」在戰後男性失業率高、女性被復員回到家庭，以及已婚婦女被禁止擔任公職的時代，極力捍衛女性工作權，因而在女子教育、同工同酬方面獲得若干成果。⁵⁷

⁵⁴ 1914 年 8 月戰爭爆發後，「國際婦女會議」(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CW) 轄下的主要委員會「和平與國際關係委員會」(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ssion, 1899) 要求國際間設立國際組織以重建和平。該組織為女性權利奮鬥時秉持的哲學是「個人主義」(*le personnalisme*)，反對將女性工具化（以經濟觀點或母親與妻子的角色看待女性）。

⁵⁵ Luc Capdevila et al., *Hommes et femmes dans la France en guerre* (1914-1945), pp. 82-83;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V. Le XXe siècle*, pp. 125-130.

⁵⁶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V. Le XXe siècle*, p. 91.

⁵⁷ 「法蘭西婦女全國會議」為「國際婦女會議」之法國支部，集結四十餘個女性組織，擁有 73,000 名各階層的女性會員，為女性教育、社會與道德權利之進步而努力，其努力曾獲得若干成果，惟多為非政治性的權利。Cf. Andrée Michel, *Le Féminisme* (Paris: P.U.F., 1979), pp. 80-81. 在「國際婦女會議」的努力下，1918 年的《凡爾賽條約》(*Traité de Versailles*) 和其後的《國際聯盟公約》(*Convention de la Société des Nations*) 均納入女性主義者奮鬥數代的「同工同酬」的訴求。Cf. Michelle Perrot, "Métiers de femmes", *Le Mouvement social*, n° 140 (1987), p. 78; Andrée Michel, *Le*

爭取政治平等權是法國女性主義者自戰爭末期起的中心目標之一。⁵⁸1917年起，宣傳婦女選舉權的運動復甦，女性主義組織領導人德拉伊爾女士（Marie de La Hire, 1878-1925）即表態支持以選舉權獎勵婦女的構想，其理由是：婦女維持了國家的經濟，形同保衛了國家；其次，婦女除了份內事之外，又扛起了男人的工作，證明其有能力，故其地位應與男人一樣。⁵⁹沉寂已久的女性主義組織因此重新要求選舉權，某些組織（例如「婦女選舉法國聯盟」）要求市鎮選舉的選舉權，某些組織則要求各級選舉的選舉權〔例如「婦女選舉權行動委員會」（Comité d'action suffragiste）、「婦女行動」（Action des femmes）〕。1917年2月14日，六個女性主義組織聯合遞交眾議院「普選委員會」（Commission du suffrage universel）一份照會（note），其中詳述婦女戰時扮演的角色與從事的社會和慈善活動。女性主義者在國會辯論婦女選舉權法案時，復以女性在戰時擔任市長一事作為要求新權利的依據。事實上，她們要求的不是「獎勵」（récompense），而是「承認」（reconnaissance），承認此次戰爭期間女性的能力以及她們的愛國心。此外，1917年10月號的《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大力宣傳婦女選舉權，美蘭（Jeanne Mélin, 1877-1964）女士的「婦女選舉權行動委員會」也表態支持。⁶⁰

一戰之後婦女選舉權運動呈現多元的局面。由於社會經濟的變化、思想的開放，以及1919年眾議院通過婦女選舉權法案，⁶¹這些情勢鼓舞了婦女選舉權支持者。因此，1920年代女性主義組織的行動模式與以前不同，它們採取新的方式：例如開辦訓練演

Féminisme, pp. 82-83. 法國一戰後女性主義高漲與薪資平等之訴求也有密切關係，1919年小學女老師開始領取與男老師相同的薪水。

⁵⁸ 另一目標是修訂《民法》。

⁵⁹ 西方婦女史專家戴波女士認為，雖然一戰時婦女嚐到自由的滋味且扛起家庭的責任，但事實上戰爭只是讓男人與女人傳統角色和活動領域的區分更清楚：男人在前線、女人在家庭。Cf. Françoise Thébaud,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ome 5, *Le XXe siècle*, p. 89.

⁶⁰ Michelle Perrot, "Travaux de femmes", *Le Mouvement social*, n° 105 (1978), p. 99; Michèle Riot-Sarcey, *Histoire du féminisme*, p. 75.

⁶¹ 參看注釋30。

講術的課程，讓女性主義者的演講更有說服力；也四處張貼海報和散發宣傳單。⁶²女性主義組織「母親同盟」(Ligue de la mère au foyer)則盡力使社會大眾相信婦女獲得選舉權不會妨礙她們承擔在家中應盡的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

天主教徒也漸漸接受社會的變化。一戰後大多數支持婦女選舉權的天主教徒舉行大型集會，這是兩個因素促成的：戰後宗教紛爭平息以及教宗本篤十五世(Pape Benoît XV, 1854-1922)於1919年7月15日向英國記者表示支持婦女選舉權。隨後有數個天主教婦女團體成立，以支持女性主義者或婦女選舉權運動者的訴求，例如：1920年成立的「支持婦女投票全國聯盟」(Union nationale pour le vote des femmes, UNVF)，會員有十萬人；1925年成立的「公民與社會女性主義者聯盟」(Union féministe civique et sociale, UFCS)，會員有一萬人；「法國女人愛國同盟」(Ligue patriotique des Françaises, LPF)，會員有五十萬人。⁶³但是，「宗教」並非天主教徒轉而支持婦女選舉權的唯一因素，當時全球性的女性運動也有影響，這些女性運動強調：給予婦女更多責任反而可以拯救家庭制度，⁶⁴法國天主教徒採取的行動即是追隨此種世界潮流。1900年代只有極少數天主教婦女要求選舉權，但是後來她們逐漸接受女性主義的主張，也要求改革，一戰之後就有更多婦女加入上述組織。

此外，傷殘及退伍軍人組織亦支持婦女選舉權。這些組織合計擁有約300萬會員，是男性的社交場所，在兩次大戰的戰間期一直企圖扮演道德法官的角色，對法國兩性關係的走向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它們關切戰爭寡婦選舉權的問題，由於它們的關心，傷殘及陣亡戰士的家庭權利始能保全。此類組織的人數甚

⁶² 四處張貼海報和散發宣傳單為鼓吹婦女選舉權的「支持婦女選舉女性行動同盟」(Ligue d'action féminine po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偏好的方式。此同盟係布雷(Marthe Bray)女士於1926年創立。

⁶³ Steven Hauseet Anne Kenne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Women's Suffrage in France. 1869-1922",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67: 1 (janvier, 1981), pp. 11-30.

⁶⁴ Maurice Deslandres, "La Femme dans la Cité, la femme et la vie politique", *Semaines sociales de France, Nancy, 19^e session, 1927, La femme dans la société*, p. 241.

眾，例如「全國退伍軍人聯盟」(Con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anciens combattants)有35萬會員。戰爭寡婦組織的會員則合計超過60萬人，⁶⁵戰爭寡婦組織與女性主義組織關係極密切，其成員常出席對方組織之集會活動，此種密切關係使婦女選舉權運動獲得甚大助力。

1920年代女性主義有兩個須努力說服的對象：婦女和選民。1919年眾議院通過婦女選舉權法案後，反婦女選舉權者即強調婦女的 political education 極落後，一旦她們有選舉權，可能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支持婦女選舉權者也同意婦女政治經驗不足是一大問題，因此她們提出的解決方案是教育婦女如何投票。1920年代，婦女選舉權主義者首先教育婦女選舉權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將該權利轉為政治影響力，其使用的方法是四處宣傳婦女選舉權的理念，也設法增加婦女的公民知識，例如星期日在學校或市政府設立「法國小禮拜堂」(chapelles de France)，邀請國會議員、作家及婦運人士教導婦女憲法的內容。⁶⁶「婦女社會行動」(L'Action sociale de la femme)則設置「社會課程」(les cours sociaux)，教導婦女不應選黨而應看政黨的政見以決定投票對象，且選後應查證當選人的政見是否落實。⁶⁷1924年，《法國女人報》的主編米森女士在「法蘭西婦女全國會議」大會上提議各報刊載文章，教導婦女政治知識。⁶⁸在地方上，婦女選舉權組織則籌設公民教育課程，例如「東南部女性主義聯盟」(Fédération féministe du sud-est)提議在市及區(canton)政府提供婦女政治權利的教育與訓練。事實上，上述對婦女實施公民教育的措施也是欲說服反婦女選舉權

⁶⁵ Laurence Klejman et Florence Rochefort, *Égalité en marche. Le Féminism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9), p. 295.

⁶⁶ Mme Aurel, *Les Françaises devant l'opinion masculine* (Paris: Édition Sansort, 1922), p. 28.

⁶⁷ Marguerite-Augustin Féraud, *La femme devant les urines* (Paris: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et Cité, 1923), pp. 163-165.

⁶⁸ Jane Misme, "L'édition politique des femmes par la presse", *Congrès de Lyon, Palais de mutualité, 18 et 19 novembre 1924* (Paris: Conseil national des femmes françaises, 1925), p. 62.

者，希望他們改變敵對的態度。同時，婦女選舉權主義者也未放棄傳統的策略，即藉提名女性候選人之方式以遊說選民，因此她們參加 1925 年 5 月的市議員選舉。數十名婦女打破沉默走向公共場合且擔任候選人，她們之中有人獲得數千票，已逾當選所需票數之門檻，而且地方行政機構認可婦女的行動並放鬆管制。⁶⁹

婦女選舉權主義者在此次選舉時造勢極為成功，因為她們在適當時機選擇了適宜的選舉。1925 年 4 月 7 日眾議院以 68% 的支持率通過讓年滿 25 歲的婦女在市與區選舉（*l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et cantonales*）中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⁷⁰因此 1925 年 5 月的市議員選舉是一個實驗婦女選舉權的理想時機，因為它的範圍有限，而且此時婦女參與市議員選舉正可炒熱話題並獲得社會大眾的同情。婦女選舉權運動者知道，就法律規定而言，婦女在 1925 年的選舉中尚無選舉權（因尚未獲參議院同意），⁷¹但藉此次參與的行動，可以展現她們欲獲得選舉權的決心，而且 1925 年的法國婦女受戰後婦女個人主義運動的影響，比戰前更敢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她們的最主要目的是藉參與選舉向選民宣傳婦女選舉權的必要性並向參議院施壓（1925 年 5 月 3 日女性候選人列隊到參議院陳情）。⁷²女性主義者的主要動機並非當選，而是希望社會承認

⁶⁹ 此次選舉婦女參與者眾。「法蘭西婦女全國會議」在巴黎提出 80 個候選人，法國共產黨（PCF）在巴黎、巴黎郊區和外省也都提出候選人名單。

⁷⁰ Discussion des propositions de loi Louis Marin tendant à donner aux femmes l'électorat et l'égalité dès les élections de 1925 (municipales), Scrutin du 7 avril 1925, *Annales de Chambre des députés*.

⁷¹ 法國第三共和國會為兩院制，下院稱眾議院（Chambre des députés），上院稱參議院（Sénat）。眾議員由年滿 21 歲之男性公民直接選舉產生，平均每一個眾議員代表 7 萬人，任期 4 年。參議員固定名額為 300 人（男性公民須年滿 40 歲始能參選），其中 225 人由各省的省、市、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團選舉 1 至 5 人，任期 9 年，每 3 年改選三分之一。其餘 75 人（即四分之一）由國會任命，為終身職。這些終身參議員如因故出缺（例如死亡或辭職），仍由參議院自行決定人選替代之，而非重新舉行選舉。兩院均可提出法案，除財政法案須由眾議院提出並通過外，其餘法案均須獲得兩院通過，始可成為法律。Cf. Marcel Morabito, *Histoire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France (1798-1958)* (Paris: Éditions Montchrestien, 2010), pp. 285-287.

⁷² 但是 1932 年 7 月 7 日，出席的參議員中，86.3% 投票反對將婦女選舉權法律草案條文付討論，支持的參議員僅有 13.6%。參議院以共和國的政治與社會傳統價值之捍衛者自居，認為拒絕給予婦女選舉權是抗拒社會不可知的變化的最佳方式。

婦女的權利。

法共的行動不同，其女性候選人有政治任務。法共參與此次選舉除支持婦女選舉權外，也藉此反抗剝奪婦女選舉權的資本主義制度並捍衛無產階級的權益。因此，法共將女性候選人放在大多數候選人名單之首。⁷³法共的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甚至稱：「共黨為婦女選舉權所做的努力超過任何政黨。」⁷⁴但是在國會以及在社會上，共黨並非婦女選舉權的第一守護神，只有少數共黨議員在行動和言論上支持婦女選舉權，而且其行為常引起資產階級的憂慮。1919年至1936年間，眾議院支持婦女選舉權的38個草案中，只有3個是由共黨議員提出，社會黨團則提出10個，領先共黨。不過，無論共黨支持婦女選舉權的目的為何，它將女性候選人放在候選人名單之首的策略對宣傳婦女選舉權甚有效果，此即讓法國在1925年出現「女性市議員」。

此次選舉女性候選人和「國際工人法國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SFIO*)⁷⁵的候選人得票率不高，⁷⁶但共黨提名的女性候選人在巴黎平均得票率較高，為15.1%，⁷⁷共黨提名的女性候選人在外省的選舉得票率亦較高。此種現象說明選民是「票投政黨」而非「票投女性」。由於共黨選舉組織效率高，所以能成功地將女性推上政治舞台。儘管如此，選舉後新聞界並無喝采聲，因為社會大眾預期女性參與此次選舉終將被行政法院(*Conseil d'État*)宣告無效。

Discussion s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7 juillet 1932, *Annales du Sénat*.

⁷³ 例如在 Douarnenez 和 Sain-Pierre-des-Corps (在 Tours 郊區)。

⁷⁴ “L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L'Humanité*, 11 mai 1925, p. 3.

⁷⁵ 1920年12月成立。

⁷⁶ Résultat des élections, *L'Ouest-Éclair*, 4 mai 1925, p.2. Mme Pelletier 在 le Jardin des plantes (第5區)得2票；Mme Fuzier 在 les Quinze-vingt (第12區)得6票；Mme Poulvy 在 le quartier de Vienne得2票。

⁷⁷ Marguerite Faussecave 在 Pont-de-Flandres 區 (circonscription) 的第一輪選舉得29.1%選票，第二輪得29.7%選票。除此之外，Charlotte Davy 在 Batignolles 得9%選票；Mme Maranne 在 Grandes-Carrières 區得10.7%選票；Alice Burodeau 在 Necker 區得13.1%選票；Suzanne Girault 在 Belleville 得24.4%選票。Résultat des élections, *L'Ouest-Éclair*, 4 mai 1925, p. 2.

在新聞界等待行政法院宣布婦女當選無效之際，婦女選舉權主義者卻認為行政機關已經鬆綁法律，允許她們競選且當選。巴黎的 80 名女性候選人因此到市政府向塞納省省長遞交感謝函，⁷⁸其實當時是在內政部長允許下，女性候選人才能參與選舉，婦女也才能進入投票所投票。⁷⁹然而，行政法院的態度與行政機關相反，由於參議院在地方選舉之後仍然未通過婦女選舉權法案，行政法院遂宣告婦女投的票無效，女性候選人的「當選」亦無效。⁸⁰然而從「當選」後到被宣告無效這段期間，女性市議員事實上已執行其職務。若論政黨對婦女選舉權之支持度，1920 年代以具體且整體力量鼓吹婦女選舉權的政黨是共黨，儘管該黨的動機是政治大於女性主義。「國際工人法國支部」雖然支持婦女選舉權，但彼時該黨的女性工作人員比率不超過 3%。⁸¹研究兩次大戰期間女性主義或政黨的史家均發現，婦女甚少參與政黨，但婦女甚少參與政黨不意味婦女對行政無興趣，也有許多婦女在政府機構擔任要職。⁸²

為了喚起更多人對婦女政治權利之了解與重視，婦女選舉權主義者布雷女士採取理論與行動並進的策略。⁸³她的理論基礎是：婦女須獲得選舉權，是因為她們能做所有的工作、是因為法國在這方面落後其他國家、是因為婦女有益於政治事務；家庭主婦能應付高昂的物價、婦女能美化城市、婦女能幫助、保護與教育兒

⁷⁸ “Manifestations féministes”, *Le Temps*, 5 mai 1925, p. 4.

⁷⁹ “L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ont eu lieu hier”, *L'Ouest-Éclair*, 4 mai 1925, p. 2. “La journée électorale”, *Le Petit Parisien*, 4 mai 1925, p. 3.

⁸⁰ 行政法院在 1926 年 1 月 29 日、3 月 5 日、7 月 28 日的判決中宣告女性參選市議員選舉無效。

⁸¹ Charles Sowerwine, *Les Femmes et le Socialisme* (Paris: Presse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78), p. 118.

⁸² Sylvie Schweitzer, *Les femmes ont toujours travaillé, une histoire du travail des femmes,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Paris: Jacob, 2002), p. 282. 如 Gabrielle Letellier 和 Marguerite Thibert 在國際勞工局 (Bureau international de Travail) 任職、1917 年 Jeanne Tardy 在財政部副國務秘書辦公室任職、Berthe Milliard 在勞工部長辦公室任職。

⁸³ 有關布雷女士的「支持婦女選舉女性行動同盟」活動的畫冊收藏於巴黎市的 Marie-Louise Bouglé 歷史博物館 (Marthe Bray 檔案)。

童。她將上述論點以不同的方式傳播出去：接受訪問、透過散發傳單、海報、明信片等。布雷女士接受英國報紙訪問時說，婦女的首要角色是為人母，但現代生活讓婦女有更多閒暇去做她們想做的事，因此她們應有與男人相同的政治權利。⁸⁴

但是如何說服廣大的外省婦女支持婦女選舉權則是一大挑戰，因為許多反對給予女性選舉權的參議員宣稱外省婦女不在乎有無選舉權。根據「婦女選舉法國聯盟」在 1919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對鄉村婦女而言，投票仍是陌生的事情。為了廣為宣傳，布雷女士組織了一支「女性十字軍」(la croisade féministe)，到一些平常婦女選舉權宣傳活動很少到達的偏遠地方，喚起婦女對選舉權的認識。1926 年 9 月 8 日布雷女士與 11 名婦女搭乘一部車身漆上「女人要投票」(La femme doit voter) 口號的轎車，從巴黎出發，穿越了西部三十多個城市與村莊，所到之處，她們散發傳單、海報和明信片；有時在廣場停留，放映婦女選舉權教育影片或演講。根據報紙的報導，該組織的方法極有效，因為喚起了婦女反思自己的處境。⁸⁵1920 年資金充裕的「支持婦女投票全國聯盟」(UNVF) 在外省廣設分支機構、發行報紙以及舉行多次集會活動。⁸⁶婦女選舉權組織除了選擇在外省召開會員大會之外（例如 1919 年「法蘭西婦女全國會議」在史特拉斯堡召開大會，1924 年在里昂），也在外省舉行示威遊行。此種新策略是 1920 年代婦女選舉權主義很重要的發展；換言之，教育和喚起民眾的意識是兩個重點工作。

然而，在立法層面，婦女選舉權並未因此而有進展，某些婦女選舉權運動者遂決定採取激進手段。從 1920 年代末起，婦女選舉權主義者進一步採取激烈抗爭行動，爭取婦女選舉權的運動掀開新頁。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維紅女士 (Maria Vérone, 1874-1938) 和「婦女權利法蘭西同盟」(Ligue française pour les droits des femmes,

⁸⁴ Interview de Marthe Bray. *Paris Time*, 8 septembre 1926, p. 5.

⁸⁵ E. Hazarakis, "2000 km d'autocar", *L'Infran*, 8 octobre 1926, p. 4.

⁸⁶ Christine Bard, *Les Filles de Marianne. Histoire des féminismes, 1914-1940* (Paris: Fayard, 1995), pp. 268-273.

LFDF) 的中堅份子重新採用戰前歐克勒女士 (Hubertine Auclert, 1848-1914) 和佩樂帖女士 (Madeleine Pelletier, 1874-1939) 示威遊行的策略, 她們駕駛宣傳車遊行巴黎和外省、在盛大的「巴黎市集」(la Foire de Paris) 設置宣傳婦女選舉權攤位。⁸⁷1928 年夏,「婦女選舉法國聯盟」的主席布朗絲薇克女士呼籲婦女拒絕繳稅,「婦女權利法蘭西同盟」則威脅要跟監參議員的行蹤,以收集並公布他們傷風敗俗的行爲。⁸⁸娃波 (Jeanne Valbot) 女士在 1928 年甚至用鏈條將自己鎖在參議院的椅子上,使會議中斷。婦女選舉權主義者也在有廣大群眾聚集的地方舉辦遊行示威,例如 1931 年在殖民地展覽會旁示威。

1935 年 5 月 5 日至 12 日法國舉行市議員選舉,女性主義組織希望藉此機會再度表明女性爭取選舉權的意志。該年巴黎的市議員選舉有二個特色:候選人若非代表女性主義組織(如「婦女選舉法國聯盟」),即是代表政黨。巴黎選民深知投給女性候選人的票最後可能被行政法院宣告無效,因為女性候選人的資格尚未被法律承認,但是女性主義組織不希望女性在此次選舉中缺席。共黨女性組織「婦女聯盟」(Union des femmes)於 1935 年 5 月 5 日官方投票日,在巴黎和巴黎郊區的市鎮設立服務婦女的選民服務處和投票小站,呼籲婦女積極前往「模擬投票」,當時有數十名婦女到「婦女聯盟」自行設立的投票小站投票。⁸⁹上述作為既是女性主義

⁸⁷ Florence Rochefort, "La citoyenneté interdite ou les enjeux du suffragisme", *Vingtième Siècle*, 42 (avril-juin, 1994), pp. 41-51.

⁸⁸ Cécile Brunschvicg 的信件 "Le vote des femmes", *Le Temps*, 17 août 1928, p. 3; Christine Bard, *Les Filles de Marianne. Histoire des féminismes, 1914-1940*, pp. 159-160.

⁸⁹ 1935 年 5 月 5 日投票日,「婦女聯盟」派人在各區 (arrondissement) 散發傳單。女性主義者設立三十幾個投票小站,這是靠近官方投票所的小站,她們在那裡放置印上女性候選人姓名的選票以及用帽盒製成的投票箱。但後來遭到警察干涉,投票小站工作人員被要求拆除投票小站,薇絲女士等人拒絕並向警察潑灑麵粉,她們旋遭逮捕,但不久即被釋放。另外四個投票小站的人員也仿效薇絲 (Louise Weiss, 1883-1983) 女士等人的行為。"Les échos", *Le Figaro*, 6 mai 1935, p. 3; "La poudre parle à Paris, mais c'est la poudre de riz que jettent les suffragettes", *L'Ouest-Éclair*, 6 mai 1935, p. 3; Georges Ravon, "Chez les suffragettes, une journée qui sent la poudre", *Le Figaro*, 6 mai 1935, p. 4. 薇絲女士有「歐洲之母」(Mère de l'Europe)

的行動也是政治的行動，女性主義者的目的不是要讓女性當選，而是要推展婦女選舉權運動。從「模擬投票」的選舉結果可以看出婦女對選舉權的態度：18,959票中，16,357票投給候選人薇絲女士，⁹⁰民意已走在法律之前。外省的婦女選舉權活動則欲證明反婦女選舉權者所稱「巴黎以外的婦女不在乎有無選舉權」是錯誤的，例如，維埃納省（Vienne）的省議員選舉係與參議員選舉同時舉行，該省競選連任的參議員杜普隆帖（Raymond Duplantier, 1874-1954）是反女性主義者，經常在參議院發表藐視婦女的言論，在該省婦女選舉權運動者的努力下，成功地使他落選。⁹¹

為了引起社會大眾的關切，1930年代中葉新的婦女選舉權組織成立後採取激進的手段，婦女選舉權運動遂風起雲湧。政治記者出身的薇絲女士在1934年創立「新女性」（La Femme nouvelle）時曾說：「我認為，要成功，就應該把女性主義置入現實生活中……應該使群眾快樂而非說教，使輿論注意、感動，簡言之，使全國為我們的目標而努力。」⁹²她認為唯有媒體的力量可以達成這個目的，因此她的計畫是讓媒體報導婦女選舉權運動。在此理念下，婦女選舉權組織發動多次示威遊行，採取的行動如1935年5月12日市議員選舉時，在巴士底廣場發動示威遊行；⁹³1936年在法國盃足球賽決賽時，以及1936年6月28日在總統出席的全國馬術競賽（le Grand Prix de Longchamp）開場，⁹⁴以及在1936年的世界杯足球賽場上釋放氣球。1936年4月國會議員選舉時，薇絲女士曾參與婦運團體舉辦之巴黎第五選區國會議員的「模擬選舉」；

之稱，她自一戰起即為和平奔走，是激進婦女選舉權主義者中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⁹⁰ Georges Ravon, "Chez les suffragettes, une journée qui sent la poudre", *Le Figaro*, 6 mai 1935, p. 4.

⁹¹ Louise Weiss, *Combats pour les femmes, 1934-1939, Mémoire d'une européenne*, tome 3 (Paris: Albin Michel, 1980), p. 98.

⁹² Louise Weiss, *Combats pour les femmes, 1934-1939, Mémoire d'une européenne*, tome 3, p. 21.

⁹³ Louise Weiss, *Combats pour les femmes, 1934-1939, Mémoire d'une européenne*, tome 3, p. 89.

⁹⁴ Henry Thétard, "Le favori mieux a gagné le grand prix", *Le Petit Parisien*, 29 juin 1936, p. 4.

⁹⁵兩年之前她也曾在香榭麗舍大道（les Champs-Élysées）旁陳列一個巨大的地球儀，並在上面特別標明所有已給予婦女選舉權的國家。⁹⁶爭取女權行動獲部分新聞界之支持：例如《晨報》（*Le Matin*）從 1935 年 1 月 25 日到 5 月 12 日，總共 120 天的報紙上，有 80 天刊文支持婦女選舉權，該報也舉行男女均可投票的「模擬公投」。⁹⁷

不過，此類激進女性主義者占女性主義者中的少數，溫和的女性主義者是女性主義者中的主要勢力。1930 年代社會危機（經濟大恐慌）引發法國政治上的緊繃，再加上法西斯主義崛起，民主制度受此衝擊而不穩定，女性主義也遭遇同樣的困境，婦女選舉權組織有式微之勢，社會上「母親」越來越多，「母性為女性自然的功能」的思想成為主流，連過去一向認為女性是資本主義與家庭雙重壓迫下的受害者的法共亦支持此種思想。資產階級女性願意在女性主義組織內為婦女權利奮鬥是因為她們認為婦女在社會上的行為受限、低薪、被剝奪選舉權和許多民事權利。她們要求權利，但不願使社會動盪而導致資產階級的價值遭到質疑或貶抑。她們之中多數仍忠於傳統的家庭觀，認為女性有應扮演的社會角色，而且兩性角色是互補的，因此接受政府反避孕、反墮胎的政策。

因此，1930 年代後半葉，婦女選舉權的鬥爭行動從激進轉為溫和。婦女選舉權主義者事後發現，民眾不喜歡破壞國家級競賽的行為，有些民眾甚至可能因此轉而反對婦女選舉權，因此婦女選舉權組織再度將其鬥爭的目標轉向國會。1936 年 6 月 6 日，4,000 名婦女選舉權支持者聚集國會前請願，各婦女選舉權組織聯合派

⁹⁵ 此次國會議員「模擬選舉」，薇絲女士與女飛行員菲娜（Denise Finat）女士共獲得 14,732 票。Louise Weiss, *Combats pour les femmes, 1934-1939, Mémoire d'une européenne*, tome 3, pp. 114-180.

⁹⁶ 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aris: P.U.F., 2000), p. 22.

⁹⁷ 《晨報》於 1935 年 3 月 16 日舉行的「模擬公投」結果如下：368,809 票支持婦女選舉權，1,764 票反對婦女選舉權。“Le vote des femmes au théâtre Michel”, *Le Matin*, 17 mars 1935, p. 1.

出的11名代表被眾議員邀請進入國會，眾議員並答應提出法案及立即討論。⁹⁸但是婦女選舉權主義者有時仍會採取吸引公眾目光的行動，尤其是薇絲女士身旁的人士較喜歡引起媒體注意，參眾兩院因而成為她們的目標。例如：她們在國會開議時守在國會門口向議員陳情；⁹⁹分送「勿忘草」(myosotis)給議員，意思是：「勿忘我」；贈送襪子給參議員，含意是：即使婦女投票，也會把家務顧好；她們在眾議院議場牆上張貼海報，上面以紅色字體寫著：「法國女人必須投票！」但隨即被眾議院庶務人員撕下；她們也在參議院向參議員丟擲襪子和傳單。¹⁰⁰此外，薇絲女士在某參議員的辦公室窗外製造噪音，也多次用鏈條將自己鎖在參議員的座椅上。與英國相較，法國的婦女選舉權運動者甚少使用暴力抗爭的手段，原因是擔心觸犯國家的法律和失去人民的尊重，然而她們的溫和手段獲得更多婦女的支持：「婦女選舉法國聯盟」在1920年有10萬會員；「法蘭西婦女全國會議」在1929年有15萬會員，1936年增加到30萬人。¹⁰¹

四、維琪政權的保守政策以及「自由法國」臨時諮議會與臨時政府之突破性方案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次年春，德軍大舉入侵法國，第三共和垮台。新成立的維琪政權強調傳統價值的保守政策

⁹⁸ 有關請願的部分，請參考Christine Bard, *Les Filles de Marianne. Histoire des féminismes, 1914-1940*, pp. 338-339; “Une magnifique démonstration des femmes devant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L’Humanité*, 7 juin 1936, p. 1; Louise Weiss, *Combats pour les femmes, 1934-1939, Mémoire d’une européenne*, tome 3, p. 124. 1936年7月30日眾議院針對眾議員Alexandre Brack-Desrousseaux提出的有關在市鎮選舉授予婦女政治權利的草案進行投票時，該草案獲得78.5%的眾議員投票支持，有488位眾議員支持給予婦女完整的政治權利。Discussion s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30 juillet 1936,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⁹⁹ 婦女選舉權主義者分別前往眾議院所在地「波旁宮」(Palais Bourbon)和參議院所在地「盧森堡宮」(Palais du Luxembourg)向議員陳情。

¹⁰⁰ Roger Dardenne, “La première séance de la nouvelle Chambre”, *Le Figaro*, 2 juin 1936, p. 3; “Au Sénat. Politique et chaussettes”, *Le Figaro*, 3 juin 1936, p. 4.

¹⁰¹ Christine Bard, *Les Filles de Marianne. Histoire des féminismes, 1914-1940*, pp. 235-237.

對婦女選舉權極為不利，但海外的「自由法國」的議會與政府卻有突破性的思維與作法。

（一）維琪政權的保守政策

二戰爆發後，一戰時的情境似乎重現，男人被動員，女人重新被徵召生產軍需物質。大部分女性主義組織將其訴求暫時擱置一旁，且以其資源支持國家的對外戰爭，例如它們設立「女性活動中央辦公室」（*Bureau central des activités féminines*）以徵召婦女；許多婦女選舉權主義者亦與政府合作，以展現其組織之效能並證明婦女能對社會負起責任，婦女選舉權運動暫時中斷。

法國政府領導人員當元帥於1940年6月17日向德軍求和，並於7月10日建立新政權（維琪政權），¹⁰²第三共和垮台。國家元首掌控行政與立法權，參眾兩院均休會，¹⁰³新憲法重新強調男女活動領域的差異。

維琪政權將法國戰敗歸因於第三共和的制度、1789年揭櫫的理想、社會階級分裂、現代女性主義。該政權認為，共和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導致國家「變性」（*dégénérescence*），即「女性化」。因此「自由」與「婦女自治」（*l'autonomie des femmes*）同受譴責，¹⁰⁴婦女成為1940年法國戰敗的代罪羔羊，新政權要她們培養犧牲的精神，俾法國能重新站起來。1940年起，維琪政權在民族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的意識型態下，新三部曲「工作、家庭、祖國」（*travail, famille, patrie*）取代「自由、平等、博愛」，企圖藉此改造法國成為一個建立在性別與家庭主義價值觀之上的社會。¹⁰⁵此價值觀乃是重拾1789年以前的價值觀：反個人主義並

¹⁰² 在德軍閃電戰術下，法國迅被擊潰，法德之間實際上並無真正戰爭，法國年鑑派史家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因此稱之為「奇怪的戰敗」（*l'étrange défaite*）。Cf. Marc Bloch, *L'Étrange défaite*. Paris: Franc-Tireur, 1946.

¹⁰³ Acte constitutionnel n° 2 du 11 juillet 1940 規範國家元首的權力。Acte constitutionnel n° 3 du 11 juillet 1940 則規定國會休會。

¹⁰⁴ Hélène Eck, "Les Françaises sous Vichy", in Françoise Thébaud (éd.), *Histoire des femmes*, vol. 5 (Paris: Plon, 1992), pp. 155-156;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63.

¹⁰⁵ Francine Muel-Dreyfus, *Vichy et l'éternel féminin* (Paris: Le Seuil, 1996), p. 80; Ralph

強調家庭是社會的支柱。家庭成為新秩序的礎石，國家被視為一個大家庭，國民像親人一樣，彼此血緣的聯繫保證了民族血統的純正性。個人的權利應盡量減少，以利於家庭基礎的穩固；模範家庭是一個由丈夫（一家之主）領導的三個孩子的家庭；婦女的首要角色是「母親」——其子女的教師。在「母親」此一崇高角色下，女性應消除自我，發揚服從、溫和、愛與慈善的美德，為家庭和孩子犧牲奉獻。維琪政權批評第三共和教育政策下的學校是「個人主義學校」，因此全面改革小學教育，讓女孩接受家事教育，形塑女性認同。《1940年10月11日法》禁止已婚女性和年逾50歲的婦女擔任公職，因結婚而離職的婦女可獲得一筆退職金；¹⁰⁶在政府的勸告下，私人企業解雇女性，將工作轉給男性。¹⁰⁷維琪政權希望建立理想化的女性角色，¹⁰⁸性別角色的模糊被認為是危險的且基本上違反自然，女性的訴求被認為將導致社會分裂，¹⁰⁹婦女回到家庭，則道德秩序會恢復。換言之，女性的社會命運建立在其生物命運（*le destin biologique*）與其被認定的特殊本質之上。¹¹⁰

「家庭」與「母親」是維琪政權婦女政策的兩個主軸。該政權認為家庭解體是法國沒落以及戰敗的元兇，因此鼓勵結婚、刁難離婚（*la loi du 2 avril 1941*）；1930年代已簡化的夫妻離婚程序，在維琪政權的管制下，變得比以前複雜，夫妻離婚不易。為了鼓勵婦女留在家中，1941年3月起給予婦女家庭津貼（*les allocations familiales*）作為補償（例如單薪家庭在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即可領取津貼至其20歲）。此外亦推行「家庭投票制」（*le*

Schor,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 232 ;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p. 23-24.

¹⁰⁶ Francine Muel-Dreyfus, *Vichy et l'éternel féminin*, p. 82 ;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69.

¹⁰⁷ 但1942年初，為了動員勞工協助德軍，《1940年10月11日法》被凍結。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69.

¹⁰⁸ Francine Muel-Dreyfus, *Vichy et l'Éternel féminin*, p. 92.

¹⁰⁹ Francine Muel-Dreyfus, *Vichy et l'Éternel féminin*, p. 111.

¹¹⁰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p. 65-66.

vote familial)，給予法籍小孩的父親更多選票。¹¹¹1941年5月起，爲了將女性「神聖化」(sacralisation)，維琪政權將原來的「母親日」(la journée des mères)改爲國定假日「母親節」(la fête des mères)。除了上述鼓勵措施外，維琪政權也採取制裁措施，任何違反母性或生育的行爲均在壓制之列，因爲那是「不道德、違反自然，以及對祖國有害」。¹¹²墮胎於是被視爲傷害法國人民的行爲，《1942年2月15日法》嚴厲制裁協助婦女墮胎者（例如醫師、助產士），¹¹³生育超過4個孩子的母親可獲頒獎牌。

《1940年11月16日法》規定二千個居民以上的城市市長由省長任命，市議員從市長的建議名單上遴選；該法第13、14條允許任命婦女爲市議員，¹¹⁴但這些婦女是以母親的身分出席市議會（同時也有父親或家庭代表出席）。此政策之目的不是讓婦女代表個人，而是代表家庭，此政策反映出該政權的家庭意識型態：不是給予婦女權利而是承認其做爲母親的功能，給予婦女有限的政治參與機會以防止她們遠離家庭。換言之，維琪政權發揚婦女的傳統角色，將「母性」與「家庭」理想化，要求兩性各司其職，此種政策其實是延續並強化一戰之後法國的生育主義與家庭主義。¹¹⁵該政權的目標是重建家庭和作爲社會基礎的傳統家屬等級結構。1942年9月的法律再次確認丈夫的權利以及家庭中的等級結構，目的似乎是欲重建法國男人的男性氣概：由於無法保衛國家，也無法對占領者（指德軍）發號施令，男性政權只好將矛頭對準家庭，將女人限制在母親的角色裡。

面對維琪政權的保守政策，法國婦女的態度不完全相同，但

¹¹¹ 父親可投兩票：一票代表他自己，另一票代表他的家庭。

¹¹² 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 24; Thierry Blöss et Alain Frickey, *La femme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 42;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66.

¹¹³ 1943年7月，一名爲孕婦進行墮胎的助產士被判處死刑。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67.

¹¹⁴ Simone Verdeau, *L'Accession des femmes aux fonctions publiques*,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Toulouse: Imprimerie moderne, 1942), p. 151; 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 24.

¹¹⁵ Simone Verdeau, *L'Accession des femmes aux fonctions publiques*, p. 169.

是抗拒者少，適應和順從者多。由於該政權的女性觀與天主教會的觀點相近，因此獲得基督教女性主義（le féminisme chrétien）者之支持。¹¹⁶

（二）臨時諮議會與臨時政府之突破性方案

二戰時只有少數法國人參與抗敵運動（la résistance）。事實上，參與抗敵運動的確切人數不易計算，因為工作性質屬於地下行動（clandestin）的關係；參與者當時多數是隱姓埋名，默默為國家做事。據估計，1944年參與抵抗運動者約40萬人（占法國人口1%，其中2萬人遭殺害），且多為男性，年齡介於13至29歲者超過半數。參與抵抗運動者之中也有女人與外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來自東歐的猶太人）。女人大都以擔任後勤、供應食物、擔任聯絡人（agent de liaison）等傳統的角色作掩護，其中很多人匿名，因此不為外界所知。¹¹⁷其中有少數女性負責重要任務，例如參與戰鬥和領導某個小組，¹¹⁸有的女性（如 Jeanne Bohec）甚至曾製造爆裂物。但是「全國抗敵委員會」（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CNR）在1943年宣示重建法國的計畫時，¹¹⁹完全未提到女性地位的問題，也未明確支持婦女選舉權。該委員會委員安如（Claire Andrieu）提出的政策綱要於1944年3月15日獲表決通過，但該綱要未提及承認婦女的政治權利，而是說：「擴大民主的基礎」和「所有公民在法律之前絕對平等」。¹²⁰

¹¹⁶ Francine Muel-Dreyfus, *Vichy et l'Éternel féminin*, p. 189;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p. 68-69.

¹¹⁷ Hanna Diamond, *Wome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France, 1939-1948: Choices and Constraints*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 pp. 98-105.

¹¹⁸ 例如 Marie-Madeleine Fourcade 指揮一個有3,000人的聯絡網。Nicole Châtel (éd.), *Des femmes dans la résistance* (Pari: Julliard, 1972), pp. 153-154.

¹¹⁹ 「全國抗敵委員會」於1943年5月27日成立，為法國本土之抗敵組織，成員包括各種抗敵運動的代表、工會組織代表、共黨、社會黨、激進黨（le parti radical）、人民民主（les démocrates populaires）和右派保守勢力（la droite conservatrice）之代表。此委員會於1944年8月25日加入法國臨時政府。Cf. Michel Mourre (éd.) *Le Petit Mourre. Dictionnaire de l'histoire*, pp. 973-974.

¹²⁰ Claire Andrieu, *Programme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15 mars 1944.

該綱要未明言「婦女」，卻明確提到「土著與殖民地人民」，¹²¹此種差異顯然是綱要草擬者刻意而為的結果。

婦女戰時的抗敵表現在臨時諮議會的討論中雖然經常被強調，¹²²但並非所有議員都準備立即承認婦女的政治權利。支持婦女選舉權的議員中，共黨議員葛聶（Fernand Grenier, 1901-1992）的角色極為關鍵，因為他在 1944 年 3 月 24 日全會中提出支持婦女選舉權的修正案。根據其回憶錄之記載：當時臨時政府提出的草案擬給與女性選舉國民議會議員的權利，但拒絕給與她們在市和區的選舉權。當時臨時諮議會的委員會由激進黨籍議員吉奧科比（Paul Giacobbi, 1896-1951，科西嘉人）擔任主席，他仍延續第三共和時代激進黨反對給與婦女選舉權的立場並藉程序問題予以阻撓，其理由為：若在婦女第一次參與選舉時，因許多男性在戰爭中死亡，男性人口銳減，且男性戰犯尚未被遣返，在此情況下，則女性選民人數將多於男性選民人數。吉奧科比其實是擔心女性獲得選舉權會增加教士的影響力。他將該份女性權利已經很少的草案進一步弱化，修改成只給與女性被選舉權，不給與選舉權。¹²³婦女選舉權在臨時諮議會並非政治問題，故所有黨派均有贊成及反對者，但由於激進黨議員人數較少，因此臨時諮議會中反對勢力較弱。臨時諮議會大多數議員原則上支持婦女選舉權，但提出若干問題，他們的意見可歸納為下面四點：（1）投票條件惡劣，可能會有舞弊發生，且時間上來不及將女性選民名單作好；（2）許多男性缺席（因戰死或被俘），選民性別將失衡；（3）若選舉結果不如預期，將使婦女票喪失可信度；（4）不應讓臨時諮

¹²¹ 參綱要的第四點。“Mesures à appliquer dès la Libération du territoire”, *Programme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15 mars 1944.

¹²² 例如 André Philip, “Débat sur la réforme de l'État”, 20 novembre 1943,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Albert Darnal, “Débat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France après la libération”, 24 mars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François de Menthon, “Débat sur la réforme de l'État”, 22 janvier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¹²³ Fernand Grenier, *C'était ainsi... (souvenir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9), p. 167.

議會扮演立法機關的角色。¹²⁴

事實上，上述意見在兩次大戰期間也曾經出現過。議員們意見的分歧點主要在於時機是否適當以及要持續或切割第三共和的政策。在回應反婦女選舉權的意見時，許多議員指出，¹²⁵婦女在戰時既是勞工又是抗敵者，值得因其角色而獲得選舉權，他們不認為準備新選舉人名單有困難。當時有兩件事值得留意：第一是媒體的力量，在臨時諮議會通過婦女選舉權法案之前，媒體已搶先報導婦女將可投票，婦女因而產生期待，臨時諮議會許多議員亦因此承受民意的壓力。第二是華隆（Louis Vallon，1901-1981）的發言，其發言極為重要，他強調臨時諮議會不應再落入第三共和的夢魘之中，而且應以授予婦女選舉權的方式證明沒有落入第三共和的夢魘之中。¹²⁶

1944年3月24日臨時諮議會針對解放後的政府組織法案進行辯論。法案第17條建議允許婦女能像男性一樣被選舉。¹²⁷進行討論時，葛聶再度提出先前被委員會否決的修正案，並排除各種對婦女選舉權不利的小動作。他提出的修正案內容如下：「在與男性相同的條件下，女性將是選舉人與被選舉人。」（*Les femmes seront électrices et éligibles dans les mêmes conditions que les hommes.*），亦即在原條文的「被選舉人」前面加上「選舉人」。¹²⁸表決該修正案時，77位出席議員中，10位棄權（占12.99%），16位反對（占

¹²⁴ Fernand Grenier, *C'était ainsi... (souvenirs)*, pp. 167-168.

¹²⁵ 如 Fernand Grenier、Albert Darnal 和 Jacques Duclos。

¹²⁶ Fernand Grenier, *C'était ainsi... (souvenirs)*, pp.167-168; William Guéraiche, *Les Femmes et la République. Essai sur la répartition du pouvoir de 1943 à 1979*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1999), p. 45. 華隆所謂的「夢魘」，是指第三共和參眾兩院在許多法案上（包括婦女選舉權法案）的立場僵持不下，導致國家機器空轉的情形。

¹²⁷ “Débat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France après la libération”, 24 mars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¹²⁸ Fernand Grenier, *C'était ainsi... (souvenirs)*, p. 167; Le procès-verbal de la discussion, “Débat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France après la libération”, 24 mars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20.78%)，51位贊成（占66.23%），修正案獲得通過。¹²⁹投贊成票的議員為社會黨籍、共黨籍和一部分戴高樂派。第三共和的教條與措施是一戰以來改革的主要障礙，臨時諮議會的多數議員希望永遠埋葬它。葛聶提出的修正案成為1944年4月21日臨時政府領導人戴高樂簽署並發布的《1944年4月21日法令》（l'ordonnance du 21 avril 1944）的第17條（Titre IV, art. 7）。¹³⁰此條法令使法國選民數目加倍，從1,200萬人增加到2,450萬人。¹³¹

法國婦女於1944年被授予選舉權是否因為政府要補償她們二戰時為抗敵運動所作的奉獻？¹³²戰後某些抗敵者強調，婦女參與抗敵運動與戰後獲得政治權利有密切關聯。¹³³例如作為臨時諮議會裡婦女選舉權主要捍衛者之一的葛聶，二戰之後參加多次相關研討會，他在1975年的研討會中主張婦女參與抗敵運動是獲得選舉權的決定性因素。¹³⁴他對婦女的崇敬與發言的場合有關，那次發言是在共黨的外圍組織「法國婦女聯盟」（Union des femmes françaises）舉辦的研討會上，出席者均屬志同道合之士。

但是婦女參與抗敵運動與獲得選舉權之間的關係受到許多抗敵者的質疑。抗敵女性玻琳（Célia Berlin）指出，對大多數婦女

¹²⁹ Fernand Grenier, *C'était ainsi... (souvenirs)*, p. 167.

¹³⁰ 該法令主要內容為關於解放後公權力的組成方式，其中第17條為有關選舉人之規定。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p. 76-77.

¹³¹ 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 25.但是殖民地的土著女性至1958年始獲得參政權。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79.

¹³² 由於女性抗敵者的貢獻長期被低估，二戰之後許多政治人物均強調政府應承認她們的貢獻並給予勳章。後來第五共和追認6名女性（其中4名已故）為1,024名男性的「解放伙伴」（compagnons de la Libération）。Luc Capdevila, “La mobilisation des femmes dans la France combattante (1940-1945)”, *Clio*, n° 12 (2000), pp. 77-78; Michèle Riot-Sarcey, *Histoire du féminisme*, p. 87.

¹³³ 例如臨時諮議會委員René Ferrière於1968指出：「有多少博學婦女，甚至是女博士，知道她們的公民權不是始自1789年或1804年？我參與抗敵運動的姐妹們，妳們在國家裡的地位和公民資格都是應得的。」René Ferrière, *Chemin Clandestin, 1940-1943* (Paris: Julliard, 1968), p. 189.

¹³⁴ Fernand Grenier, “La résistance et le droit de vote aux femmes”, *Les Femmes dans la résistance* (Paris: Éditions de Rocher, 1977), pp. 258-262; Jane Jenson, “The Liberation and New Rights for French Women”, in Margueret Randoiph Higonet et Jane Jenson (ed.), *Behind the Lines*, pp. 278-279.

而言，抗敵運動不是政治的行爲，當然就不是要求權利的演講台。她說：「大部分婦女戰後在社會上和家庭中的狀況與戰前無異。有人給我們選舉權是事實，但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改變。」¹³⁵史學家荻雅蒙（Hanna Diamond）對土魯斯（Toulouse）婦女解放的研究指出，許多參與抗敵運動的婦女認為參與抗敵與獲得選舉權之間的關係不密切。

質言之，參與抗敵運動可能非婦女獲得選舉權的決定性因素。儘管以前的歷史著作和人民觀念認為抵抗運動與婦女選舉權有密切關係，但事實上很難將參與抗敵與婦女於 1944 年獲得選舉權畫上等號。首先，就當時的情況而言，婦女非爲了獲得獎勵或補償才參與抗敵，她們是爲了捍衛某種價值。況且，許多抗敵女性的事蹟直到今日始被發現，當時並不爲人知，補償理論對此無法提出解釋。此外，補償理論在 1944 年不若它在 1919 年和 1922 年那樣重要，因爲補償理論忽視了十九世紀末以來婦女選舉權主義者所有的努力。婦女參與抗敵運動是要表現她們在社會上的活動力和自信，而這種活動力和自信，她們在二戰之前即曾證明。

戴高樂在其回憶錄中說：「1944 年春，我簽署的法令結束了數十年來的爭論。」¹³⁶婦女獲得選舉權是否因爲戴高樂支持女性主義？許多專家（例如 Mariette Sineau）認為，1944 年 4 月的法令給予所有婦女與男人一樣完整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非因爲戴高樂支持女性主義，而是政治算計的結果，目的是讓保守的婦女票限制共黨的威脅，或者讓同盟國看到戴高樂採取與民主國家相同的措施（給予婦女選舉權）。¹³⁷上述觀點不無道理，婦女選舉權其實是法國整體改革的一部分，因此並非戴高樂一個人的功勞。

許多歐洲國家（如英國與德國）的婦女選舉權改革與有關男

¹³⁵ Célia Bertin, *Femmes sous l'Occupation* (Paris: Stock, 1993), p. 218.

¹³⁶ Charles De Gaulle, *Mémoires de guerre*, tome III, *Le Salut: 1944-1946*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France, 1971), p. 71.

¹³⁷ Mariette Sineau, *Profession:femme politique. Sex et pouvoir sous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litiques, 2001), p. 29; Sian Reynolds,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Gender and Politics*, p. 220.

性權利的改革同時進行，法國婦女選舉權改革與該國的其他改革亦有系統性的關係。臨時諮議會從 1943 年成立起，即已對國家改革計畫進行研究，為戰後法國的建構作準備。「自由法國」的臨時政府代表自 1943 年起也多次與臨時諮議會議員針對婦女選舉權議題進行對話，且明確地將婦女的民事權利納入國家改革計畫之中。¹³⁸從與會者的發言可知：1944 年該諮議會通過給予婦女選舉權，是想與第三共和劃清界線，亦即第三共和垮台使得法國的許多改革能夠進行，包括婦女選舉權案。¹³⁹換言之，導致第三共和崩潰的二戰引發了一個政權更新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婦女選舉權延續戰前的討論，但最後結果是政治決裂所促成的，這才是改革的決定性因素。

在臨時政府與臨時諮議會的支持下，法國婦女的選舉權終於在 1945 年的第一次選舉前，載入法律條文中。1945 年 4 月 29 日市議員選舉（地方性選舉）是法國女性第一次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結果有 10,000 名女性當選市議員。同年 10 月 21 日的制憲國民會議議員選舉最受矚目，這是女性第一次參與中央級民代選舉，¹⁴⁰

¹³⁸ 臨時政府代表為 François de Menthon, Henri Queuille 與 André Philip。William Guéraiche, *Les Femmes et la République. Essai sur la répartition du pouvoir de 1943 à 1979*, pp. 40-41; André Philip, "Débat sur la réforme de l'État", 20 novembre 1943,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André Philip, "Débat sur la réforme de l'État", 22 janvier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François de Menthon, "Débat sur la réforme de l'État", 22 janvier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¹³⁹ François de Menthon, "Débat sur la réforme de l'État", 22 janvier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由於 1944 年 3 月 7 日臨時政府發布命令，給予阿爾及利亞某些穆斯林選舉權，故同時進行法國婦女選舉權的改革。1945 年 8 月政府發布兩個法令，規定「解放後所有的海外人民均可派代表出席國會。」阿爾及利亞人包括在內。Mohammed Sahia Cherchari, "Indigènes et citoyens ou l'impossible universalisation du suffrage", *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60 (2004), pp. 764-765.

¹⁴⁰ 1945 年 10 月 21 日同時舉行公投，公投題目是：「一、新議會應否授予臨時政府起草一份憲法的責任？二、如果應該制訂一份新憲法的話，則臨時政府為暫時行使公權力而擬訂的方案是否可以接受？」此為女性第一次參與公投，總計有 96% 的法國人投贊成票。政黨方面，除了仍忠於第三共和的激進黨人外，幾乎所有政黨都投

586 名當選的眾議員中有 33 名女性（占眾議員總數之 5.6%，其中 16 名是共黨黨員），¹⁴¹女性參議員占 3.6%；當選的女性大多數曾參與抗敵運動或為抗敵者之寡妻。¹⁴²從上述數字可看出，女性擔任國會議員的比例仍遠低於男性，但是選民人數增加一倍，已經改變了法國的政治生態。

五、結論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革命者揭櫫的權利原則是自由、平等、博愛為內涵的「普遍主義」（l'universalisme），普遍主義意味男女權利與義務應平等，但事實上大革命之後建立的卻是「排他的民主」（la démocratie exclusive），將婦女排斥於政治權利之外。此種源自《薩利克法典》（la Loi Salique）精神的排他性日後復因婦女被認為與宗教有特殊之聯結，以致其政治權利在第三共和時代備受壓抑，再加上一次大戰後政府倡導生育主義，婦女的傳統角色被強調，因此當多數歐洲國家紛紛賦予婦女選舉權時，法國女性在政治上的落後地位所形成的「法國落伍」（le retard français）即更為顯著。¹⁴³

其實二十世紀初的法國婦女正處於進步力量與保守力量的交會與衝突點上。一戰開始後，婦女為家庭和國家犧牲奉獻，扛起過去男人的社會責任，因此對自己的能力產生高度信心，而且戰

贊成票。同日新選出的國會因此亦是制憲國會。Cf. Serge Berstein et Pierre Milza,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II. 1930-1958* (Paris: Éditions Complexe, 2009), pp. 388-389.

¹⁴¹ Le Monde, *Les femmes et la politique. Du droit de vote à la parité* (Paris: Le Monde et E.J.L., 2001), p. 11; Hanna Diamond, *Wome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France, 1939-1948: Choices and Constraints*, pp. 206-207; 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p. 3-26.

¹⁴²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p. 76-78.但大多數女性之參選意願低於男性。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 3.

¹⁴³ 「法國落伍」此詞出自 Yolande Cohen et Françoise Thébaud (dir.), “Le sacre de la Citoyenne? Réflexions sur le retard français”, *Féminismes et identités nationales* (Lyon: Centre Jacques-Cartier, CNRS, 1998), p. 84.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 27.

後婦女選舉權主義者比戰前更積極推動婦女選舉權，希望女性與男性享有同等的政治與民事權利，社會輿論亦逐漸支持婦女選舉權；換言之，一戰之後進步力量在法國社會不斷滋長，直迄二戰開始時。然而，一戰帶來的人口與經濟危機直迄二戰開始時仍未改善，以拯救國家的名義反對婦女選舉權的保守力量遂獲得存在甚至強化之正當性。這兩股力量在戰間期衝突極為劇烈，但由婦女遲未獲得選舉權一事可以看出保守力量在衝突中長期占據上風。

因此有學者認為法國女性選舉權其實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獲得的。德納耶（Bruno Denoyelle）和瑪婷（Virginie Martin）的研究指出，當時男性對女性獲得政治權利一事爭論不休，他們認為女性參政權非當時重要之事，許多男性甚至不知道 1,250 萬女性已獲得選舉權；某些新聞媒體與政治學者不認為她們是「公民」，而是特殊的身分；部分輿論甚至擔心女性參與選舉會使其失去女性特質。¹⁴⁴但是學者羅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認為女性獲得選舉權是女性長期為法律上自治的政治主體（un sujet politique juridiquement autonome）奮鬥的成果，此所以法國主教團（l'épiscopat français）呼籲女性去投票，「俾重整法國」；女性團體〔「公民與社會女性聯盟」（Union féminine civique et sociale）和「法蘭西女性聯盟」〕亦呼籲女性務必前往投票。¹⁴⁵某些學者則著重於二戰對婦女選舉權之影響；例如赫芙特瑪姿（Véronique Helft-Malz）和蕾薇（Paule-Henriette Lévy）認為女性獲得選舉權係下列四項因素之功：德軍占領區女性的決定性影響力、婦女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流亡倫敦的經驗改變了戴高樂的兩性觀念、未來與共黨共治的前景促使戴高樂接受該黨的要求。¹⁴⁶布洛斯

¹⁴⁴ 德納耶和瑪婷的研究轉引自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 77.

¹⁴⁵ Pierre Rosanvallon, *Le Sacre du citoyen. Histoire du suffrage universel en France* (Paris: Gallimard, 1992), p. 203.

¹⁴⁶ Véronique Helft-Malz et Paule-Henriette Lévy,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 25.

(Thierry Blöss) 和傅立屈 (Alain Frickey) 則認為，女性在抗敵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解放後社會的連續動盪、反抗維琪政權鄙視女性的政策，這三項是 1944 年 4 月 21 日臨時政府發布法令給予婦女選舉權的原因。¹⁴⁷

事實上，法國社會在一戰之後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趨勢：就量而言，女性人口已超越男性且女性壽命較男性長；就質而言，婦女的教育程度日益升高，婦女參與的社會領域越來越多，是許多行業不可或缺的專業人員。¹⁴⁸在此種趨勢下，保守力量只能暫時抗拒給與婦女選舉權之社會壓力，無法永遠拒絕承認婦女的政治權利。因此關於臨時政府賦予婦女選舉權的決定，下列解釋應較合理：首先，葛聶提出的授予婦女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修正案以及戴高樂頒布的相關法令看似偶然之舉，其實並非革命式的變化，那是在有關婦女處境多年的辯論以及法國社會觀念從一戰到二戰期間緩慢但不平靜的遞嬗的結果；數十年來婦女參與社會和經濟活動，使她們的政治權利受到重視，因此不僅僅是二戰的影響而已。再者，1944 年法令中的婦女選舉權條文是包含在法國重新建構的措施之中，此所以該法令特別為法國女人制訂了第 17 條，¹⁴⁹此一嚴謹的表述證明賦予婦女選舉權的決定不是貿然的行動，而是周詳的考慮。換言之，1944 年的公權力再造與國家改革計畫是實現婦女選舉權的最後催化劑。

然而，女性獲得普選權是否意味她們已獲得第四共和憲法所謂的完整公民權？事實上，女性的地位在該法令發布後並無太大改變。維琪政權的保守政策在二戰之後並未完全被撤除，母親的

¹⁴⁷ Thierry Blöss, *La dialectique des rapports hommes-femmes* (Paris: P.U.F., coll. "Sociologie d'Aujourd'hui", 2001), p. 98.

¹⁴⁸ 1880 年法國女性壽命較男性長 2.4 歲，1950 年法國女性壽命較男性長 5.7 歲。受大學教育的婦女比率，1914 年為 6%，1933 年增加到 36%。Cf. Thierry Blöss et Alain Frickey, *La femme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 119. Emmanuel de Las Cases, Discussion s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30 juin 1932, *Annales du Sénat*.

¹⁴⁹ "Ordonnance du 21 avril 1944 relative à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France après la Libération", Le site de la digithèque des matériaux juridiques et politiques de l'Université de Perpignan.

功能與妻子的傳統角色再度被歌頌，男性認同與男性氣概重新被強調，部分女性在戰後甚至被清算：有 454 名女性因通敵被處死；1943 至 1946 年間約 2,000 名女性因曾與德軍或德國平民交往而被公開剃髮羞辱。¹⁵⁰剃髮是一種性別化的暴力行為，法國政府此種作為形同介入私人生活，使女性失去身體自主權，「女體」被視為「國體」之象徵。¹⁵¹二戰後婦女參政人數仍微不足道，政治制度的遊戲規則並無太大改變，儘管有大量的女性擁有政治權利，可是法國的政治運作仍然較有利於男性。1946 年的憲法明文規定兩性平等，但究其內涵，保護「母親」之用意大於保護「女性之自由」。¹⁵²從女性就業率的變化即可略窺一二：1931 年女性就業率為 52%；但是 1946 年女性就業率下降至 45%（該年男性就業率為 88%），其中已婚女性不到 20%；1954 年女性就業率再下降至 38%（660 萬職業婦女）。¹⁵³誠如葛瑞奇（William Guerraiche）在其《婦女與共和國》（*Les Femmes et la République*）書中所言：「憲法之前的平等並未產生男公民與女公民之間更平等的權力分配。」¹⁵⁴

¹⁵⁰ Hanna Diamond, *Wome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France, 1939-1948: Choices and Constraints*, pp. 71-97.

¹⁵¹ Michelle Zancarini-Fournel,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pp. 71-72.

¹⁵² 1946 年憲法前言謂：「法律保障女人在所有領域與男人平等的權利。」「國家保障所有人，尤其是兒童、母親和年老工人，健康的保障、母親的安全、休息與舒適。」Cf. Constitution du 27 octobre 1946, Préambule, paragraphe 3 et 11. Stéphane Rials, *Textes constitutionnels français* (Paris: P.U.F., 1982), pp. 80-81.

¹⁵³ Michèle Riot-Sarcey, *Histoire du féminisme*, p. 85.

¹⁵⁴ William Guerraiche, *Les Femmes et la République. Essai sur la répartition du pouvoir de 1943 à 1979*, p. 226.

引用書目

一、史料

（一）法國第三共和參議院檔案

Discussion s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21 novembre 1922, *Annales du Sénat*.

Discussion s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30 juin 1932, *Annales du Sénat*.

Discussion s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7 juillet 1932, *Annales du Sénat*.

（二）法國第三共和眾議院檔案

Discussion sur une proposition de loi accordant aux femmes le droit de vote dans certaines élections, 8 mai 1919,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Discussion sur une proposition de loi accordant aux femmes le droit de vote dans certaines élections, 15 mai 1919,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Discussion sur une proposition de loi accordant aux femmes le droit de vote dans certaines élections, 8, 15 et 20 mai 1919,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Discussion des propositions de loi Louis Marin tendant à donner aux femmes l'électorat et l'égalité dès les élections de 1925 (municipales), Scrutin du 7 avril 1925,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Discussion s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 30 juillet 1936,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Rapport de Pierre-Étienne Flandin, annexe n° 5095, 18 octobre 1918, *Annales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三）「自由法國」臨時諮議會與臨時政府檔案

“Débat sur la réforme de l'État”, 20 novembre 1943,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Débat sur la réforme de l'État”, 22 janvier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Débat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France après la libération”, 24 mars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Mesures à appliquer dès la Libération du territoire”, *Programme du 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 15 mars 1944.

Le procès-verbal de la discussion, “Débat sur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France après la libération”, 24 mars 1944, *Supplément au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de l’assemblée consultative provisoire*.

(四) 法律文件

Acte constitutionnel n° 2 du 11 juillet 1940.

Acte constitutionnel n° 3 du 11 juillet 1940.

Constitution du 27 octobre 1946.

“Ordonnance du 21 avril 1944 relative à l’organisation des pouvoirs publics en France après la Libération”, Le site de la digithèque des matériaux juridiques et politiques de l’Université de Perpignan.

Rials, Stéphane, *Textes constitutionnels français*. Paris: P.U.F., 1982.

(五) 回憶錄

De Gaulle, Charles. *Mémoires de guerre*, tome III, *Le Salut : 1944-1946*.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France, 1971.

Grenier, Fernand. *C’était ainsi... (souvenirs)*.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59.

Weiss, Louise. *Combats pour les femmes, 1934-1939, Mémoire d’une européenne*, tome 3. Paris: Albin Michel, 1980.

(六) 報紙及雜誌文章

1. 報紙

“Au Sénat. Politique et chaussettes”, *Le Figaro*, 3 juin 1936.

Brunschvicg, Cécile. “Le vote des femmes”, *Le Temps*, 17 août 1928.

Dardenne, Roger. “La première séance de la nouvelle Chambre”, *Le Figaro*, 2 juin 1936.

Hazarakis, E.. “2000 km d’autocar”, *L’Infran*, 8 octobre 1926.

Interview de Mar the Bray. *Paris Time*, 8 September 1926.

“Manifestations féministes”, *Le Temps*, 5 mai 1925.

“La journée électorale”, *Le Petit Parisien*, 4 mai 1925.

“La poudre parle à Paris, mais c’est la poudre de riz que jettent les suffragettes”, *L’Ouest-Éclair*, 6 mai 1935.

“Le vote des femmes au théâtre Michel”, *Le Matin*, 17 mars 1935.

“Les échos”, *Le Figaro*, 6 mai 1935.

“L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L'Humanité*, 11 mai 1925.

Ravon, Georges. “Chez les suffragettes, une journée qui sent la poudre”, *Le Figaro*, 6 mai 1935.

Résultat des élections, *L'Ouest-Éclair*, 4 mai 1925.

Thétard, Henry. “Le favori mieux a gagné le grand prix”, *Le Petit Parisien*, 29 juin 1936.

“Unemagnifique demonstration des femmesdevant la Chambredes deputes”, *L'Humanité*, 7 juin 1936.

2. 雜誌

Perrot, Michelle. “Travaux de femmes”, *Le Mouvement social*, n° 105, 1978.

Perrot, Michelle. “Métiers de femmes”, *Le Mouvement social*, n° 140, 1987.

二、專書

Abensour, Léon. *Le problème féministe: un cas d'aspiration collective vers l'égalité*. Paris: Radot, 1972

Ariès, Philippe.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Paris: Seuil, 1971.

Aurel. *Les Françaises devant l'opinion masculine*. Paris: Édition Sansort, 1922.

Bard, Christine. *Les Filles de Marianne. Histoire des féminismes, 1914-1940*. Paris: Fayard, 1995.

Bard, Christine. *Les Garçonnes. Modes et fantasmes des Annes folles*. Paris: Flammarion, 1998.

Berstein, Serge et Milza, Pierre. *Histoire de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I. 1900-1930*. Paris:Éditions Complexe, 2009.

Bertin, Célia. *Femmes sous l'Occupation*. Paris: Stock, 1993.

Bloch, Marc. *L'Étrange défaite*. Paris: Franc-Tireur, 1946.

Blöss, Thierry. *La dialectique des rapports hommes-femmes*. Paris: P.U.F., coll. “Sociologie d'Aujourd'hui”, 2001.

Blöss, Thierry et Frickey, Alain. *La femme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aris: P.U.F., 2006.

Capdevila, Luc et al.. *Hommes et femmes dans la France en guerre (1914-1945)*. Paris: Payot, 2003.

Châtel, Nicole (éd.). *Des femmes dans la résistance*. Paris: Julliard, 1972.

Chevalier, François. *Le Sénateur français, 1875-1995, Essai sur le recrutement*

- et la représentativité des membres de la seconde chambre*, coll. Bibliothèque constitutionnelle et de science politique, tome 89. Paris: LGDJ, 1998.
- Coinet, Michèle. *Le Conseil national de Vichy, 1940-1944*. Paris: Aux amateurs de livres, 1989.
- Decaux, Alain. *Histoire des françaises*, vol. 2. Paris: Perrin, 1972.
- Deslandres, Maurice “La Femme dans la Cité, la femme et la vie politique”, *Semaines sociales de France, Nancy, 19e session, 1927, La femme dans la société*.
- Diamond, Hanna. *Wome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France, 1939-1948: Choices and Constraints*.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
- Duby, Georges et Perrot, Michelle.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V. Le XX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02.
- Dupeux, George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70*. Paris: Colin, 1973.
- Féraud, Marguerite-Augustin. *La femme devant les urines*. Paris: Librairie académique Perrin et Cité, 1923.
- Ferrière, René. *Chemin Clandestin, 1940-1943*. Paris: Julliard, 1968.
- Fourcaut, Andrée. *Femmes à l'usine*. Paris: Maspero, 1982.
- Fussel, Pau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Guéraiche, William. *Les femmes et la République. Essai sur la répartition du pouvoir de 1943 à 1979*.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1999.
- Helft-Malz, Véronique et Lévy, Paule-Henriette. *Les femmes et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Paris: P. U. F., 2000.
- Higonnet, Margaret R.. *Nurses at the Front, Writing the Wounds of the Great War*.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Klejman, Laurence et Rochefort, Florence. *Égalité en marche. Le Féminism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9.
- Knibiehler, Yvonne. *Cornettes et blouses blanches. Les infirmière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880-1980)*. Paris: Hachette, 1984.
- Le Monde, *Les femmes et la politique. Du droit de vote à la parité*. Paris: Le Monde et E. J. L., 2001.
- Maruani, Margaret. *Travail et emploi des femm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0.
- Marwick, Arthur. *Women at War 1914-1918*. London: Croom Helm, 1977.

- Michel, Andrée. *Le Féminisme*. Paris: P. U. F., 1979.
- Milza, Pierre et Amar, Martin. *L'immigration en France de A à Z*. Paris: A. Colin, 1990.
- Morabito, Marcel. *Histoire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France (1798-1958)*. Paris: Editions Montchrestien, 2010.
- Morin-Rotureau, Évelyne (dir.). *1914-1918: Combats de femmes*. Paris: Autrement, 2004.
- Moulin, Anne. *Les paysan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la Révolution à nos jours*. Paris: Seuil, 1988.
- Mourre, Michel (éd.) *Le Petit Mourre. Dictionnaire de l'histoire*. Paris: Bordas/SEJER, 2004.
- Muel-Dreyfus, Francine. *Vichy et l'éternel féminin*. Paris: Le Seuil, 1996.
- Omnès, Catherine. *Ouvrières parisiennes. Marchés du travail et trajectoires professionnelles au 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1997.
- Pitrois, Yvonne. *Les femmes de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5-1916*. Genève: JH Jeheberlibraireéditeur, 1916.
- Pourcher, Yves. *La vie des Français au jour le jour 1914-1918*. Paris: Plon, 1999.
- Dupâquier, Jacques (dir.).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tome 4, De 1914 à nos jours*. Paris: P.U.F., 1988.
- Reynolds, Sian.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Gender and 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Riot-Sarcey, Michèle. *Histoire du féminism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2008.
- Rosanvallon, Pierre. *Le Sacre du citoyen. Histoire du suffrage universel en France*. Paris: Gallimard, 1992.
- Schor, Ralph.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Paris: Berlin, 2004.
- Schweitzer, Sylvie. *Les femmes ont toujours travaillé, une histoire du travail des femmes,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Paris: Jacob, 2002.
- Sineau, Mariette. *Profession: femme politique. Sex et pouvoir sous 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litiques, 2001.
- Sowerwine, Charles. *Les Femmes et le Socialisme*. Paris: Presse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78.
- Thébaud, Françoise. *La Femme au temps de la guerre de 1914*. Paris: Stock,

1986.

Thébaud, Françoise (dir.). *Histoire des femmes*, vol. 5. *La Grande Guerre, Le triomphe de la division sexuelle*. Paris: Plon, 1992.

Thébaud, Françoise.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ome 5, *Le XX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02.

Thuillier, Gilbert. *Les Femmes dans l'administration depuis 1900*. Paris: Perrin, 1988.

Verdeau, Simone *L'Accession des femmes aux fonctions publiques*,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Toulouse: Imprimerie moderne, 1942.

Zancarini-Fournel, Michelle. *Histoire des femmes en France*.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5.

三、專書論文及期刊論文：

Capdevila, Luc. “La mobilisation des femmes dans la France combattante (1940-1945)”, *Clio*, n° 12 (2000).

Cherchari, Mohammed Sahia. “Indigènes et citoyens ou l'impossible universalisation du suffrage”, *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60 (2004).

Cohen, Yolande et Thébaud, Françoise (dir.), “Le sacre de la Citoyenne? Réflexions sur le retard français”, *Féminismes et identités nationales*. Lyon: Centre Jacques-Cartier, CNRS, 1998.

Cooper, Sandi E.. “French Feminists and Pacifism, 1889-1914: The Evolution of New Vision”, *Peace & Change*, 36: 1 (January 2011).

Cova, Anne. “Généalogie d'une conquête: maternité et droits des femmes en France, fin XIXe-XXe siècles”, *Travail, Genre et Société*, 3 mars 2000.

Eck, Hélène. “Les Françaises sous Vichy”, in Françoise Thébaud (éd.), *Histoire des femmes*, vol. 5. Paris: Plon, 1992.

“Evolution of New Vision”, *Peace & Change*, 36: 1 (January 2011).

Grenier, Fernand. “La résistance et le droit de vote aux femmes”, *Les Femmes dans la résistance*. Paris: Éditions de Rocher, 1977.

Hause, Steven et Kenney, Ann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Women's Suffrage in France. 1869-1922”,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67: 1 (janvier, 1981).

Hause, Steven C.. “More Minerva than Mars: The French Women's rights Campaign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in Margueret Randoiph Higonnet et

- Jane Jenson (ed.), *Behind the Lin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Jenson, Jane. “The Liberation and New Rights for French Women”, in Margueret Randoiph Higonnetet Jane Jenson (ed.), *Behind the Lin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Misme, Jane. “L’édition politique des femmes par la presse”, *Congrès de Lyon, Palais de mutualité, 18 et 19 novembre 1924*. Paris: Conseil national des femmes françaises, 1925.
- Perrot, Michelle. “Grèves féminines”, *Les Ouvriers en grève*. Paris:Mouton, 1974.
- Rocheft, Florence. “La citoyenneté interdite ou les enjeux du suffragisme”, *Vingtième Siècle*, 42 (avril-juin, 1994).
- Zanta, Léontine. “Le Féminisme:s ses manifestations variées à travers les faits, les institutions, les tendances, les mouvements d’opinion”, in *Semaines sociales de France, Nancy, 19^e session, 1927, La femme dans la société*. Paris-Lyon:Chronique sociale de France, 1928.

The Impacts of the Two World Wars on French Women's Suffrage

Liu, Wen-bin*

Abstract

French government so much emphasized the natalism and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women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at it was unwilling to promot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which resulted in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acquirement of women's suffrage. But many feminine suffragists strongly and continuously protested so much against the Parliament and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that the public opinions gradually switched to support their demands. The Second World War collapsed the Third Republic and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in the Senate which had strongly opposed women's suffrage for a long ti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Vichy regime carried out some conservative policies emphasizing the traditional values. Nevertheless, by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French government was re-constructed,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new government from the Third Republic, to open a new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o follow the public opinions, the Temporary Consultative Assembly and the Temporary Government decided in 1944 to pass and publicize the edict giving suffrage to French women.

Keywords: suffrage of French women, French feminism, political status of French women, Free France, Two World Wars

*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